



# 西安地方志

2009·第6期(试刊)

(总第201期)

陕新出内印字0057号

内部交流 免费赠阅

## 目 录

### 特载

在传承中发扬 在资政上用功 在条件上保障  
——袁纯清省长视察陕西省地方志馆侧记  
..... (3)

### 学术交流

新一轮志书记述改革开放30年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范洪涛(6)

### 历代名人与西安

黄巢长安建大齐 ..... (10)

朱温和李茂贞混战长安 ..... (12)

### 人物春秋

杨虎城 ..... (14)

谢葆真 ..... (16)

马德涵先生与周总理的友谊  
..... 杨普社(17)

### 史料钩沉

东城门楼上的抗日军校  
..... 封五昌(19)

中国古代的“灭佛”事件  
..... (20)

### 西安风情

西安古城墙之明西安城军事布防  
..... (23)

南院门 ..... 彭栋为(26)

大唐不夜城——西安曲江模本新标榜  
..... (27)

### 志鉴动态

西安市区县第二轮修志经济部类志稿研讨会  
召开 ..... (29)

##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孙亚伟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委员:王 营 张 耀 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张 耀  
责任编辑:王文竹 宋亚颖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二府街 27 号  
邮编:710003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http://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Ve.xdwy.com.cn/difangzhi](http://Ve.xdwy.com.cn/difangzhi)  
E-mail:[zhangyao55@sohu.com](mailto:zhangyao55@sohu.com)  
电话:029-87296801

### 理论研究

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 ..... (30)  
对人志图照的几点思考 ..... 王耀珍(31)

###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中华老字号德懋恭水晶饼制作技艺  
..... 富小云整理(34)

### 文史拾趣

毛泽东一生读过哪些书 ..... (35)  
古人的记事本 ..... (37)  
勾践曾卧薪是谎言 ..... (39)  
词语印记一甲子 ..... (40)  
尼姑的由来 ..... (41)  
刘南垣接待御史 ..... (42)  
妙联趣谈 ..... (42)  
“幸运”的唐宋囚犯 ..... (43)  
清代黄袍有玄机 ..... (44)  
贪官为清官跑官 ..... (45)  
冬至话“数九” ..... (46)  
名人与麻将 ..... (48)  
包拯未做过宰相 ..... (50)

### 知识窗

下马威溯源 ..... (13)  
中国唐装的由来 ..... (30)  
“三思而行”本是贬义 ..... (43)  
“慈母”曾是伤心事 ..... (51)  
金龟婿的由来 ..... (51)  
鼠婚习俗 ..... (52)  
清代的滑冰 ..... (53)  
冬季别称 ..... (53)  
为何在初八“放生” ..... (54)  
古代对朋友特有的称谓 ..... (56)

### 历代诗人咏长安

老夫采玉歌 ..... (李贺)(55)

# 在传承中发扬 在资政上用功 在条件上保障

袁纯清省长视察陕西省地方志馆侧记

金秋九月,艳阳高照。九月二十九日,陕西省地方志馆开馆暨省新编地方志成果展在西安市西大街七十号隆重举行。上午十时,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袁纯清驱车专程前来视察。他先在留言簿上庄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与到会的省、市志办主任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随后,在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培仓等的陪同下,袁省长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新编地方志成果展。在省级综合展台、省军区、省武警总队展台及十一个市区展台前,他都驻足观看,详细询问编纂工作以及地方志馆的馆藏、读者容量和开放时间等情况。刘培仓主任、王新中副巡视员分别介绍了陕西省地方志历届编委会机构及成员,特别介绍到陕西省“新编地方志事业的开拓者”——陈元方同志,袁省长频频点头,非常高兴。

袁纯清在省级地方志综合展台和省军区、省武警总队展台前问:“我们是每年都要出吗?”刘培仓主任说:“年鉴是一年一本。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每二十年编修一次。一轮修志已经完成,二轮修志正在全省有序开展。我们全省首轮地方志书八十九卷,九十多册。”

走到年鉴展台时,他问道:“你们跟年鉴是什么关系?年鉴归地方志管吗?”刘主任回答说:“按照国

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地方综合年鉴属于地方志工作的一部分。”站在一旁的省地方志原主任周伯光说:“年鉴、地方志的编委会主任,都是省政府领导。”

看到宝鸡展柜时,袁省长问:“你们一般志书印多少份?”宝鸡市志办刘改荣主任回答:“四千册。”袁省长又问:“你们现在的县志编的全不全?”刘改荣说:“第一轮全部编完了,现在正在编第二轮。”袁省长说:“县志也是很重要的。”

到延安展台时,袁省长问:“你们最早的志书是什么时间的?”延安市志办王世明主任回答:“明弘治年间就有《延安府志》出版。”

袁省长走到咸阳、渭南展台,听取了咸阳市志办张英民介绍《咸阳大辞典》和《咸阳百年图志》,以及各县县志编写情况,渭南市志办刘百宽介绍各县年鉴、资料丛书情况。袁省长频频点头称许。

看到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周伯光书写的北宋关中儒学大师张载的“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条幅时,袁省长说:“字写得好哇。这是很有名的几句话,说的很全呐。”

看到榆林展台时,他问:“这个《延绥镇志》是什么时间的?”榆林市志办高峻副主任说:“这是清朝光绪年间的。”“比这个更早的还有吗?”“有。有明代万历三十年的,也

## ●特 载●

是榆林最早的志书。”

到汉中馆时，汉中市志办姜发贵主任趋前与袁省长握手，袁省长问刘培仓：“你们志办主任都来了？”刘培仓说：“这是我们地方志系统的大事、喜事啊。”看到汉中志办原主任郭鹏的照片时，刘主任介绍说：“这是全国地方志系统十位先进工作者之一。”袁省长称道：“好啊，好啊。”

走到杨凌展台，刘主任介绍说：“这是我省最小的市级单位。”杨陵农业高新产业示范区志办刘琦主任汇报情况后，袁省长点头说：“好！”

随即，刘主任介绍了历年陕西省政府有关地方志的文件，并说《陕西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是袁省长签发的。走到安康、商洛展台前，袁省长仔细观看，并问：“就这样一个馆是吧？”刘主任说：“三楼还有一个阅览室。”

在铜川展台前，刘主任打开柜台，袁省长取出一册《同官县志》，信手翻了一翻。铜川市志办谢长山主任解释说：“同官就是铜川。”袁省长说：“是从一个县发展为一个市啊。”

看到西安馆时，西安市志办孙亚伟主任说：“《西安市志》首轮志书，一共七册，九百万字。”刘培仓主任补充说：“《西安市志》的部头最大。”袁省长看了后说：“好啊！”

刘主任还向袁省长专门介绍了获得全国、全军奖励的汉中市志办原主任郭鹏、省军区史志办主任王玉杰大校，以及获得陕西省先进工作者称号的渭南市志办刘百宽主任，被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的已故蓝田县志办贺民贤主任等英模人物。

参观展台后，袁省长听了渭南市志办刘百宽主任介绍手书《祖国颂》，问：“这个是你

写的啊，是正楷书法啊。你临的什么贴？用的是什么笔？”刘百宽连忙回道：“字、词都是我写的。我学的柳体，用的是羊毫。这比习惯上使用的狼毫，需要更深的功夫。”袁省长又看了商洛市志办杨建国主任的行草，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文人啊！”

上了三楼阅览室，袁省长手指报刊阅览架，关切地问：“你们阅览室刚开馆，估计会来多少人啊？主要是写史的人来吗？一般的人会不会到这里来？搜集资料的人有可能都来查，外省的包括地方的，是不是都会来查？这是一个窗口啊。陕西历史很丰富，近代在陕西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西安事变，推动了蒋介石抗日，推动了国共合作，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啊。这个内容十分丰富，方志工作者要客观记述，对历史负责，对后世负责。地方志作为记录历史的重要工具，在资政、育人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相信省地方志馆的开馆，必将对人们进一步了解陕西历史、传承中华文明、推动科学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说到旧志文献，刘培仓主任说：“陕西历代旧志约有五百八十多种，有的省内只有名录，没有志书，有的分布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图书馆。”袁省长说：“旧志要陆续加以整理。需要到国外采集回来的，还是要采集的。”

谈及志书出版阅读，他询问省志是否已经出齐，刘主任说：“已经出齐。但有的志书印刷出版较早，而且一般省志印数最多只有三千册，出版后送一些、存一些、发一些，经过二十多年，迄今所余无几，有的也成了孤本。要给来陕考察工作的中央领导、新到我省工作的省级领导配送一套完整的图书，都很困难，我们也觉得没有尽到责任。”

袁省长说：“省、市、县志，应该重印的就要重印。编年鉴、地方志，这个经费应该是政府拿的。政府要起一个保证作用，应该确保地方志的经费。这也是记录、爱护自己的工作过程啊。要想发展，要想面向未来，就要挖掘历史资料。历史资料，这不光是一个保存的问题，还要发挥好它的作用。方志馆虽小，但却是历史的浓缩。历史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根系所在，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资源。依托这一资源，我们既可以借鉴历史上的有益经验，在传承中发扬光大，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科学、健康发展，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吸取历史上的一些教训，以史为鉴，少走弯路。我们不是要重复历史，而是要在历史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光大。有些历史过程有失误的，我们就应该加以修正，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啊。一个叫做诠释历史，一个叫做发扬光大。千万不要重蹈覆辙，以后的发展要更加科学、更加顺畅。”

袁省长还说：“地方志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也是很有意义的。搞地方志，跟其他工作相比，可能是坐冷板凳，但实际上，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第一是可以做，第二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做这个啊，本身也在长学问。所以搞地方志，起码要了解历史。要通过研究历史，成为专家、成为学问家。刚才我看你们字写的很漂亮，现在写字也好、作画也好、写文章也好，都有一个‘静’字，要静下来。搞地方志，搞史，首先要创造条件，让人静下来，静下来做学问。要把历史记录下来，记下来就是学问。”

随后，袁省长又参观了阅览室的上架图书。当他翻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的孤本志书时，问：“这些国家图书馆的书，是你们买来的吧？这是怎么印出来的？是木刻版吗？”负责阅览

室工作的张世民副处长回答说：“这是国家图书馆新版影印的，都是孤本书，发行量很少。此外，还有台湾版的旧志。”袁省长说：“所以你们这些地方志的同志们呐，有时间应该看看这些图书，成为这个方面的专家。”他又对陪同的刘培仓主任说：“你刘培仓首先要成为这个方面的专家。”刘主任说：“我要好好努力。”袁省长说：“一个大学老师研究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就能够成为专家教授，你们也应该成为专家。在哪里都可以有所作为，都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而且你们守着的，是这么丰富的历史史料啊。”

他对刘培仓主任说：“你让我给你们题词，我没有给人题过词，就说我过来看一看，这表明我是关心你们、重视你们的。”在楼道，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修志是要资政，就是支持现在的行政，总结历史的经验。资政就是支持我们现在的政府。还有一个叫育人，也就是教育我们现在的人和后人。”

走到办公区，袁省长与年鉴编辑部工作人员亲切地握了握手。他问：“你们现在有多少人啊？”刘主任回答说：“三十五个。”袁省长说：“三十五个？你们人手不够，还可以花钱请别人做一些事情。实际上，第一你们要做研究，第二还可以‘发包’啊。借助社会力量，比如大学有那么多研究历史的教授，还有档案馆搞历史的人，你们聘请人，这个钱政府是可以花的。这个钱是小钱，很有必要花一些。如果不借助社会力量，你自己怎么都搞不过来。你们自己起一个‘派工’的作用啊。这样做事灵便，便于你们搞研究。”

视察完毕后，袁省长一行走出方志馆大楼，在众人的掌声中与大家告别。

# 新一轮志书记述改革开放 30 年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范洪涛

**编者按:**第二轮修志工作已经全面铺开。改革开放作为第二轮修志内容中的重中之重,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本文作者从其所在地区已出版的 9 部续志为例,对新一轮志书中记述改革开放 30 年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现摘取其中一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

## (一)关于既要写出时代特色,又要写出地方特色的问题

写好改革开放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但在各个地方贯彻实施时又必然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这是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由上到下、由点到面逐步推进的,先从农村开始,从南方开始,进而至沿海大城市,进而推向全国。某一个特定行政区域作为全国、全省(市、自治区)的组成部分,只是一个局部,对当地来讲,实施改革开放首先由外因来推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统一的,但各地域的实施并不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时间上有先有后,每一项重大改革从启动、试点、面上推开、深化到攻坚,整个过程呈现的阶段性地并不一样。而且全国性统一的政策措施,在地方贯彻时必须与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地方特点结合起来,外因的推动必须与内因的变化相结合,因而必然既有统一性,又有特殊性。上海地区在解放前是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

又存在中国最早的租界,是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地域,情况十分复杂。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特别繁重,又是计划经济体制贯彻执行最为彻底的地区,因而改革难度也特别大。与南方比较,上海地区的全面改革开放启动较晚,1990 年中央作出浦东开发开放的重要战略决策后,上海改革开放的步伐才大大加快。中央要求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更好地为全国改革开放服务,全力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通过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加快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因此,记述上海的改革开放,应该具有浓重的地方特色。再拿上海地区所属的区县来讲,市中心区的中央商务区和其他市中心区比较,市中心区与近郊由原来的县变成的市区比较,以及由远郊的县变成的市区和目前还是县作比较,其地域范围、人口、环境、资源、城市建设、产业结构、历史文化积淀都很不相同,都各有特色。由此可见,同一个历史时期,两个不同行政区域,可以同时以改革开放和发展为主线,可以同样写出时代特色,但其深层次的内涵和地方特色是不一样的。因此新一轮志书记述改革开放 30 年,既要写出时代特色,又要特别重视写出地方特色。

## (二)关于在记述改革开放中如何体现

### “以人为本”的问题

首轮新志书编纂中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除了“人物”卷外,其他门类的编纂中往往“见物不见人”、“见事不见人”、“见单位(机关、企业、事业、团体)不见人”、“见群体不见个体”。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是对“地方志生不立传”原则的误解。“生不立传”不等于“生人不能入志”。地方志与“隔代写史”不同点在于方志主要记述当代的历史,记当代历史如果离开活生生的人来记事、记物、记活动就脱离了根本。有不少优秀志书鉴于这个教训,运用“以事系人”的方法在各门类中记述了大量生人的活动,这是值得提倡的。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活生生的广大人民群众来创造、来完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哪里谈得上成就。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上、精神上的需求。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是人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反映在物质生活上,也反映在精神生活上。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大发展,最突出的是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前不久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中,有67%的成就归功于中国。但最根本的变化是在这场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为先导的深刻变革中,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很大冲击,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成为人们精神状态的主流。人们对改革充满成就感和自豪感。各条战线都涌现大批先进人物。共产党员也更好地保持和发展了先进性。因此,编纂新一轮志书必须牢

牢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刻认识到,30年来在改革开放推动下,既出现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又出现了人的全面发展,要十分重视把生动的人的活动,用“以事系人”和人事结合的典型实例,以及丰富的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变化记述在志书之中。

新一轮方志在记述人的活动时,还要注意到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已发生显著变化。改革开放之前,社会阶级阶层的构成主要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这样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改革开放后,这两个阶级一个阶层都发生了分化。如果以资源占有为基础的阶级分析和以职业地位为基础的阶层分析这样两个社会学分析纬度来考察,我国当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大致可以发现十个轮廓较为清晰的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农业劳动者中有相当部分已进城成为农民工)(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1月15日)。新一轮志书在记述人的活动时要重视比以往复杂得多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就上海特大城市讲,尤其要重视管理人员(干部)、白领阶层、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进城的农民工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这方面,《奉贤县续志》做得比较好,值得借鉴。

### (三)要重视记述好改革开放后涌现的新生事物和综合性、跨门类的复合事物

与首轮志书比较,上海地区已出版续志中出现了许多前志没有的新生事物和跨门类事物,这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出现的。经济领域中,如“生态环境”、“绿色产业”、“现代服

务业”、“超市(便利店、连锁店)”、“要素市场”、“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保险业”、“租赁业”、“会展业”、“咨询业”、“信息业”、“物流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企业”、“开发区”、“工业园区”、“都市型工业”、“生态园区”、“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招商引资”、“对外服务”、“对外经济合作”、“国内经济合作”、“技术监督”、“知识产权”、“人才市场”、“土地批租”、“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住宅小区”、“街坊建设”、“廉租住房”、“房地产市场”、“平改坡”、“立体交通”、“地铁”、“磁悬浮列车线”、“高速公路”、“高架路”、“立交桥”等;政治领域中,如“两新组织”、“流动党员”等;文化领域中,如“精神文明建设”、“素质教育”、“应试教育”、“文化市场”、“影像市场”、“游戏机房”、“歌舞厅(卡拉 OK)”、“电视剧”、“网吧”等;社会领域中,如“社会保障”、“社区建设”、“文明小区”、“安全小区”、“社区文化”、“医保”、“低保”、“综合保险”、“家政服务”等。经济领域中有不少新事物,在解放前和建国初也存在,如“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交易所”、“保险业”等,但改革开放后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出现,名称一样,性质已经起了变化。有些是复合性事物,如“大型企业集团”,主要是资本运作,下面有许多实体子公司,有的属经济领域,也有属于文化领域,如影视公司、出版业等。

还有一种跨门类的事物,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济”,既属于经济大类的劳动部门,又属政府系统的民政部门,还属社会大类的社会问题,在分门类记述时,出现了交叉现象。

新一轮志书在搜集资料时估计还会出现更多新名称,在记述时要重视这些新的事物,

把它们来的来龙去脉记述清楚。

#### **(四)既要充分记述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要记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矛盾、起伏、反复和教训**

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往往选择风险最小的切入点,先易后难,越难的改革越留到后面做,致使有些方面遗留的问题越来越多,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有些改革采取双轨制度或过渡性措施也会带来新的矛盾。由于缺乏经验,改革过程中出现起伏,必要时采取整顿调整措施。有些改革深化后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抵制和阻力。有些政策措施下达地方部门,受到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的干扰。有些执行干部自身的意识、信念、品质出了问题,就会出现诸如不顾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片面追求上项目、高指标;有的搞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有的在土地问题上不顾群众利益,甚至侵犯群众利益;有的在收益分配上不公平,使弱势群体有所扩大;少数干部贪污受贿腐败堕落等等。笔者认为地方志对这些矛盾、问题、曲折、教训以至反面材料,应该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作适当记述,不应采取趋避态度。

至于有些改革方案、政策措施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边摸索,边实践,难免有时要走弯路,甚至前后的政策、规定发生矛盾,随后出台新的政策、规定。碰到这种情况,也应实事求是写清过程,不必采取趋避态度。

#### **(五)关于恢复编写资料长编和重要入志资料加注释的问题**

上海地区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编纂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时,规定要编写资料长编,《上海财政税务志》在出版志书的同时,还出版了《上海财政税务志资料长编》,在方



志界和学术界中反映良好。但是,90年代后期,这项制度并没有坚持下来。究其原因,编写资料长编工作量很大是一个原因,但有些修志单位的上级领导不顾实际情况把修志周期缩得较短,甚至“限时限刻出书”,也是原因之一。上海市修志领导机构在审批志稿时,没有把编写资料长编作为必须执行的制度来强调也不无影响。对此方志界和学术界有许多专家学者都建议新一轮志书编纂时应尽快恢复这项传统的编修制度,并建议志书中刊出重要资料时应加注注释。笔者也认为恢复编写资料长编和志书刊出重要资料加注注释,对确保新一轮志书质量有重要意义。不少方志专家曾经一再指出“编写资料长编是编纂志书不可逾越的阶段”,有了长编,入志资料的来源、出处均有案可查,也是鉴别筛选入志资料必不可少的程序。有了长编及重要资料注释,学术界应用地方志资料时也可以大胆放心。因此,建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地方修志领导机构在发布编修志书质量条例时应加以明文规定,并在审稿把关时坚决执行。凡没有资料长编的志稿,一律不能出版。

政府精简机构、转换职能后,主要抓政策引导、宏观调控、行政管理和加强服务,不再管具体经济业务,原来的经济业务由新组建的企业集团来承担。这对新一轮志书落实修志任务和进行搜集资料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为此,建议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制订贯彻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地方立法工作,另一方面,各级修志机构也要改进搜集资料的方法,面向社会,扩大途径,多渠道、多方面建立搜集资料网络,修志人员还应亲临第一线,加强调查研究工作。

#### (六)加强修志队伍培训,提高其政治思

#### 想、志德修养和专业业务水平,加强修志机构制度建设是确保编纂新一轮志书质量的关键

首轮志书编纂人员绝大部分已经离退休,被再聘用继续修志的很少,修志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处于青黄不接状态。当前政府系统修志机构尚较健全,人员比前年轻化,文化程度也比前有所提高,其中不乏比较优秀的人员。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相当多新的修志人员缺乏修志实践经验和系统扎实的方志学基础理论学习,对于修志的“辛苦、艰苦、清苦”的工作环境还不一定适应;对于必须具备“实事求是”、认真细致的思想作风和对子孙后代和历史高度负责精神,以及必须具有奉献精神,可能还认识不足。而原来政府经济、文化领导机构在职能转变后,如需承担本系统修志任务,必将依靠已经由主管局、院、所、办变成集团企业的单位。这些单位将完全重新组建新的修志队伍,上述问题将更加突出。市、区修志领导机构,虽已比较重视举办短期培训班,但尚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如果全面推开新一轮志书编纂工作,显然必须十分重视进一步对新的修志队伍培训,努力提高其政治思想和专业业务水平,尤其要提高其志德修养。要结合系统业务培训,介绍首届修志的经验教训,特别要发扬首届修志中涌现的热爱方志事业先进典型的好思想、好作风。鉴于改革开放30年来,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法规有一个提出、争论、比较成熟和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当今社会一个很大特点是处于剧烈变化的转型转轨时期,新事物大量涌现,相当部分不成熟;旧事物大量衰亡,相当部分仍有力量,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人群在剧烈变革中重新组合,有的集团、人群在改革中受益较多,甚至暴富,有的

集团、人群在改革中受益较少，甚至有所损失；人们的观念也从单一化转为多元化，主流思潮与非主流思潮同时并存；正面的东西与负面的东西交叉存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交织在一起。在上述新形势、新情况下，组织修志队伍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和改革开放的战略思想、方针政策，尤其显得重要。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志书主编在修志全过程中担负起极其重要的职责，在政治思想、理论水平、专业水平、志德修养、工作作风上都要起表率作用。思想上、工作上都要真正到位，才能率领好全体修志人员，修出一部能传给后代的良志。

根据各地试点单位的经验，除了加强对修志队伍的政治业务培训外，还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来保障修志正常运转。诸如建立和改进“志书质量标准条例”，“篇目审查报批制度”，“搜集、鉴别、选用资料的规定和编写资料长编的制度”，“修志机构内部层层责任制度、验收制度”，“修志领导机构评稿、审稿、验收制度”和有关志书出版的规章制度，都十分重要。并要加快修志地方法规的拟定，使修志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才能确保新一轮志书普遍达到更高质量水平。



## 黄巢长安建大齐

公元 874 年，是唐僖宗李儂登上皇位的头一年。是年底，农民王仙芝率数千人在长垣（今河南长垣）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次年六月，黄巢亦率领数千人在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起义，响应王仙芝。两军会合，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黄巢（？~884 年），曹州冤句人。唐末农民起义军杰出领袖。乾符五年（878 年）二月，王仙芝战死，义军共推黄巢为冲天大将军，建年号为王霸。“冲天”，即推翻唐朝的统治；“王霸”，即建立王朝或霸业。黄巢曾作一首《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充分表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和革命激情。

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经过五年的浴血奋战，足迹

踏遍了黄河两岸和大江南北。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攻占洛阳。十二月,60万大军攻潼关,旌旗遍野,声震山河。唐守关官兵投降,反为向导,直趋长安。是月初五,即公元881年1月8日,早朝刚散,僖宗在500名神策军的保护下,出金光门,仓皇逃奔咸阳。黄巢前锋将柴存已入长安。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未及逃出,遂率文武官员数十人于灞上向黄巢投降。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光辉的时刻,黄巢乘金装肩舆,从东城的春明门率领千军万马进入京城。义军将士,肩披长发,发结红绸,衣着锦绣,手执兵戈,意气风发,井然而入。从东都到西京,“甲骑如流,辘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长安百姓潮水般地涌向街头,夹道观看,太极宫被禁闭的数千宫女也出宫欢迎,并呼黄巢为“黄王”。黄巢将领尚让向长安居民庄严宣告:“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并施赠财物给贫苦百姓。

公元881年1月16日,黄巢在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举行开国大典,建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冲天大将军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并大封起义有功的将领。尚让等为宰相,朱温等为大将军,王播为京兆尹,皮日休等为翰林学士。黄巢诏令,唐原来三品以上的官员一律停职,四品以下官员统统留用,即刻报到上任。

冲天长安,满城金甲,多么威风,分多壮观!但是,黄巢在欢庆胜利、得意非凡之时,却

忘了那个正在疲于奔命向成都逃去的唐僖宗,留下一条祸根。同时也没有及时扩大胜利,收拾长安四域那些七零八落的唐军。因而给敌人留下了喘息的机会。张直方在长安集聚原来的宰相公卿,密谋劫持黄巢,迎接僖宗。黄巢觉察,给予了坚决镇压,杀张直方等人。四月,唐军重新结集,反攻长安。黄巢主动撤出长安,屯于灞上。唐军先头部队入长安大肆烧杀抢劫,黄巢义军趁乱不备,又迅即杀人长安,官军十死八九。对那些反攻倒算的不法分子,“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严厉打击,毫不留情。

金统四年(883年),黄巢兵势日窘,长安的南、西、北三面均被唐军包围着。东去通往洛阳的大道,是黄巢部将朱温控制着,他见形势日坏,竟叛变投唐。这样,长安城内,粮物奇缺,势危难守。唐朝廷又请来沙陀贵族李克用攻袭长安。二月,黄巢撤离长安,取道蓝田,退却河南。三月,尚让与李克用、王重荣战于零口(今临潼零口)。四月甲辰日,李克用沙陀兵自光泰门入长安,黄巢义军最后撤离长安。沙陀兵和唐军大肆劫掠,“长安室屋及民居存无几”。

金统五年(884年)六月,黄巢率残部千余人退入山东泰山一带,在虎狼谷战败牺牲。历时整整10年的黄巢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在长安建立大齐农民革命政权的光辉业绩永垂史册。唐王朝遭此打击,已是奄奄一息,寿终正寝的日子不远了。



## 朱温和李茂贞

“初，黄巢据京师，九衢三内，宫室宛然。及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黄巢起义军对长安城内宫殿建筑给予了较好的保护，然而唐诸道兵却对之进行了无情的破坏。

光启元年(885年)三月，唐僖宗从成都回至长安。其时长安已是荆棘满城，狐兔纵横。十二月，李克用引沙陀兵入长安抢掠，长安“复为乱兵焚掠，无子遗矣”。次年正月，宦官田令孜劫持僖宗牵宝鸡(今陕西宝鸡)。四月，西北行营都统朱玫拥襄王李煊入长安，十月李煊在长安称帝。

十二月，朱玫部将王行瑜入长安，杀朱玫，焚掠京城，“士民无衣冻死者蔽地”。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僖宗回长安，一月后死去。其弟李晔继位，是为唐昭宗。

唐昭宗时，藩镇中以宣武节度使朱温(在今河南)、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在今陕西凤翔)的势力最大。宦官和朝官之间的斗争也越演越烈，各自拉拢藩镇以为援助。朱温(852~921年)，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先参加黄巢起义，中和二年(882年)叛变降唐，赐名全忠。李茂贞(856~924年)，原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

## 混战长安



(今河北博野)人。李茂贞依仗自己兵多将勇，多次入长安威逼昭帝。乾宁二年(895年)七月，昭帝惧于其威，曾逃离长安，趋南山，夜宿莎城镇(今长安县引镇)，从者数十万人，哭声震山谷。待他再回至长安时，“宫室焚毁，未暇完葺”，“百官往往无袍笏仆马”。一年后，李茂贞又入长安，纵兵烧杀，长安仅存房屋被“燔烧俱尽”。昭宗再次逃离长安，至华州。直到光化元年(898年)八月才重回长安。三年(900)十一月，禁军头领刘季述等发动政变，将昭宗软禁于少阳院，门锁熔铁锢之，兵器针刀皆不得入，只在墙壁凿一洞以递饮食。刘季述又矫诏，令皇太子李裕监国，立为皇帝。“凡宫人、左右、方士、僧、道为上(昭帝)所宠信者，皆榜杀之。每夜杀人，昼以十车载尸出，一车或上一、两尸，欲以立威。”天复元年(901年)正月，宰相崔胤发动反政变，救出昭宗。崔胤勾结朱温，宦官韩全诲勾结李茂贞，四人各为表里。

“全忠欲迁都洛阳，茂贞欲迎驾凤翔，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京城大骇，士民亡窜山谷，百官皆不入朝，阙前寂寞无人。十一月，韩全诲逼昭宗至凤翔，投依李茂贞，长安“士民布衣纸及布襦者，满街极目”。朱温率兵7万人入长安，崔胤等迎于长乐坡，促朱温以兵迎驾。朱温、李茂贞混战关中，天复三年(903年)，朱温打败李茂贞，李茂贞杀韩全诲，与朱温和解，并将昭宗交给朱温，回到长安。天祐元年(904年)，朱温杀崔胤，逼昭帝迁都洛阳。“驱徙士民，号哭满路，老幼襁属，月余不绝。”朱温又遣其部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官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千年古都长安从此失去了昔日的规模和盛况，成为一片废墟。长安人民对朱温等破坏长安的罪行切齿痛恨，大骂于路曰：“国贼崔胤，召朱温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

· 知识窗 ·

## 下马威溯源

下马威的本意是指官吏初到任时，借故严厉处分下属，以显示威风。

下马威一语出自《汉书·叙传》。班固记叙其伯祖父班伯因定襄时局混乱，而自请担任定襄太守，定襄豪门大户“畏其下车作威，吏民竦息”。意思是说他们担心班伯初到任时要对下属显示威风，所以有所收

敛。这里的“下车”是指官员初到任。古人有用下马、下车表示官员到任的习惯。所以后来“下车作威”便被“下马威”代替。

后来下马威从初到任时要对下属显示威风，到泛指一开始就向对方显示自己的威力。例如清代李渔《蜃中楼·抗姻》就说：“取家法过来，待我赏他个下马威。”

## 杨虎城

杨虎城(1893~1949),号虎城,亦称虎臣。陕西蒲城人。10岁入私塾,13岁因贫辍学在一家饭铺作堂倌。其伯父参加反清组织哥老会,清廷多次搜捕未获,1908年将其父杨怀福捕去绞死于西安,时杨虎城15岁。后杨虎城联络穷苦人结成中秋会,并加入哥老会。

1911年西安起义后,杨率中秋会部分成员加入张云山部的向字营,与清军作战于乾州(今乾县)、永寿一带。中华民国成立后,军队裁撤,杨于1913年退伍返乡劳动。后因打死劣绅李桢遭县衙通缉被迫流亡,其间又劫夺了澄城县解往西安的一批税款。官府后将其收编为地方民团,杨被委任为孙镇东乡民团团总。

袁世凯阴谋称帝,杨参加了陕西护国军,在朝邑(今属大荔)、华县、华阴一带截击袁军,与陆建章部作战,屡获胜利。1916年杨部被整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杨任营长。

1918年1月杨率部参加陕西靖国军,任左翼军第五游击支队司令,同年8月任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1921年8月冯玉祥督陕后,对靖国军进行改编,杨坚持靖国军旗帜,迎于右任于武功,重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任第三路司令,与直系军阀多次激战,



1922年秋冬率部进入陕北。

杨在榆林期间,成立安边教导队,结识了中共党员魏野畴,其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冬,杨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率部与刘镇华的镇嵩军及麻振武部在渭北作战,配合国民军第二军、第三军在豫西与刘镇华、憨玉琨的战争。1925年7月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率部入陕后,将杨部改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任师长。1926年4月,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围攻西安城期间,杨率部与李虎臣、卫定一等坚守孤城8个月,直到11月国民军联军援陕军抵达,才里应外合赶走了刘镇华的镇嵩军。西安解围后,1927年2月杨任国民军联军第十路(5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

集团军第十军)总司令,不久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与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会师中原后改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同直鲁联军在陇海线徐州以西作战半年,后奉命转至皖北太和休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后,杨虎城拒绝执行捕杀共产党员的命令,还将魏野畴、南汉宸等近百名在陕、甘等地的共产党人安插在自己的部队中,并授以要职,其间杨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未被批准。南京政府对十军不积极“清党”十分不满,1928年初十军归第一集团军指挥,参加二次北伐,杨则去日本休养,同年11月回国就任第二十一师师长。

1929年春杨投奔蒋介石,任新编第十四师师长(不久改为第十七师)。1930年中原大战时,杨任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率部对阎、冯作战,自豫西转战回陕,10月29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锐意治陕,重抓教育和水利事业,注意培养人才,提倡学术自由等。“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允许谈抗日,但杨虎城主政的陕西仍有宣传抗日的自由。1932年1月,杨被国民政府特派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同年6月代理洛阳行营主任(后设行营于潼关)。1935年5月,杨被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职。是年夏,张学良的东北军奉命入陕“剿共”,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杨与张学良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36年春,杨所

部先后与红军实现了停战,进而建议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对张、杨的言行有所警觉,遂调大量嫡系部队入陕,并于12月4日由洛阳亲抵临潼,明确要求张、杨开赴陕北进剿红军,否则便要调东北军往福建,将十七路军调往安徽。张、杨以各种方式恳求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联合各阶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根本不听。12月12日张、杨二人举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同时电请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与张、杨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2月25日,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答应逐步实施八项主张,由张学良陪同回到南京。但蒋介石到南京后先扣押了张学良,接着又逼杨辞职。1937年6月,杨虎城偕夫人与次子先后到美、英、法、捷克、奥地利、瑞士、西班牙等国考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杨在欧洲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抗日,均遭拒绝,后经宋子文斡旋于同年年11月经香港回国,甫入国门,便在南昌被戴笠囚禁。

1938年杨将军被解押长沙朱家花园、益阳桃花坪监禁,1939年起又先后被囚于贵州息烽阳朗坝、重庆杨家山和贵阳麒麟洞。在长达12年的囚禁期间,将军受尽磨难,爱妻被逼致死,中共和国内民主党派、社会贤达曾多次呼吁释放张、杨等爱国将领,蒋介石非但没有应允,反把杨转押到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

## 谢葆真

谢葆真(1913~1947),女。原名宝珍。陕西西安人。

1923年秋入西安模范女子小学读书,后辍学。1926年,刘镇华镇嵩军围攻西安,谢和方鉴昭、彭淑贞等一起组织歌咏队、演出队,慰问守城战士。1927年2月谢入中山学院妇女运动班学习,并加入共青团,不久参军入国民军联军宣传队。是年



5月,随宣传队慰问参加北伐的杨虎城国民联军第十路军,谢任该军宣传队队长,10月任驻地安徽太和县妇联主任委员,同年11月与杨虎城在安徽太和县成婚。1936年谢任西北各界妇女救国联合委员会会长。

1937年6月,谢携次子拯中随杨虎城出国考察,同年11月杨虎城回国后被困,时谢已回到西安,但毅然决然携幼子拯中同副官

阎继明、张醒民一起到南昌随杨虎城共度囚禁生活。由于长期遭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精神受到刺激,谢精神变得恍惚。

为抗议非人待遇,以死抗争,1946年11月底在重庆杨家山监狱绝食,继而吞金,经抢救脱险后绝食依旧。1947年2月8日在牢狱中悲愤而逝。

作所”,并于1949年9月6日将杨杀害于重庆松林坡“戴公祠”内。同杨一起被杀害的,还有次子拯中和在狱中出生的幼女拯贵,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宋振中,杨的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亦于同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监狱的大屠杀中牺牲。

1950年1月15日,重庆各界为杨虎城将军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翌日下午灵柩启程移送陕西,2月7日上午安葬于西安南郊少陵塬畔杜甫祠西侧,同日在北京隆重公祭。1956年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赞誉杨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 马德涵先生与周总理的友谊

□ 杨普社

近读《白石遗作润古城》一文，称当年西安市文化局“在考虑鼓楼开放的陈列布置时，就产生了求一些齐白石的作品以纪其盛的想法。后来文化局干部马毅因父亲认识周恩来总理，便承担了赴京联系齐白石为鼓楼陈列馆作画的任务”，云云。读到这里，不禁疑惑，这位马毅同志的父亲是何人，他又是怎么认识周恩来总理的呢？

马毅的父亲叫马德涵（1868年~1958年），是一位回族爱国民主人士，辛亥革命时期加入同盟会，民国元年（1912年）赴兰州从事教育工作期间与甘、青诸马如马麟、马安良等相识，马麟之子马步青曾受教于先生门下。时至1928年，马先生双耳失聪，携眷返回西安，以卖字画维持生计。“九一八”事件后，先

生即发动西安回族群众在小皮院清真寺成立了“西安回民抗日救国会”，并任会长，组织群众游行示威，抵制日货，为东北抗日将士募捐等。

1936年12月16日，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来到西安。为了营救此前陷入蒋、马军队重围的河西走廊一带的西路红军，就派在他身边工作的张文彬同志去找住在北广济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吴鸿宾同志（回族）。见面后，张让吴在西安回民中找一位关系可靠，又能和马家军说得上话的人，去营救西路军。吴鸿宾立即就向张举荐了马德涵。吴对马德涵讲明事情，并说这是周恩来同志的委托。德涵先生当即慨然应允。周恩来遂于1937年1月下旬，在小皮院清真寺的北厅，与马德涵第一次见

## ●人物春秋●

面,后于同年2月中旬,在七贤庄红军联络处(即“八办”)与先生共同研究营救方法。经过商议后,决定由张文彬、马宪民(回族,原在兰州经商)陪德涵先生于1937年2月16日飞往兰州,再乘汽车去凉州(今武威),找驻防河西走廊的马步青。因师生情谊,德涵先生受到热情接待。马德涵向马步青讲了国共即将合作抗日的形势,劝他“先优待被俘红军,再候红军派代表商量善后”,“凡事都要向前看”。马步青疑马德涵是共产党。马德涵说:“我早年是同盟会人,现在是无党派人士。你若防我是共产党奸细,不听我的忠谏,你就把我杀了。”“咱们是宗教兄弟,你父子待我为知己,我才敢与你谈时务。”马步青有些心动,愿约时间再谈。翌日晨,《凉州日报》刊登了优待被俘红军的消息。随后,马德涵带马宪民、张文彬去见马步青,继续给马步青晓以民族大义;马步青答应如数释放被俘红军。并写了两封亲笔信,一封由马德涵、马宪民带去见驻张掖的马军部下韩起功;另一封由张文彬带去青海进行营救活动。马德涵、马宪民赶到张掖,韩起功说:“黄番寺被围困的红军已被解除武装,被俘人员都未加伤害,已送往青海去了。”马德涵、马宪民返回凉州再找马步青,马步青说他已经给青海的马步芳打了电话,马步芳也表示愿释放被俘红军。马德涵、马宪民遂告辞回兰州,在兰州与张文彬会合,飞返西安。由于先生的努力,西路红军被俘官兵处境得以改善。

1937年5月,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去麦加朝觐回国,途经西安小住,德涵先生经取得

周恩来同意,在他的住所(西羊市49号)宴请马麟,周恩来同志到场。席间经德涵先生介绍,周就团结抗日救国和被俘红军问题,谈了个人的看法。事后马麟给人说:“周先生是共产党了不起的人物,有远见,很健谈,我很钦佩。”之后,马麟亲笔给马步青、马步芳写了两封信,由德涵先生同吴鸿宾再次赴甘肃、青海,将信面交二马。二马遂放回被俘西路红军3000多人。

1938年夏,德涵先生曾携其次子马毅,同去武汉探望周恩来同志,周在百忙中两次同先生会见,因先生耳聋失聪,就特意送他一副德国制造的助听器;还将马毅介绍到军委会六处三科当绘图员。不久,得悉国民党政府要迁重庆,周便通知德涵先生带孩子速回西安。

解放后,德涵先生先后任省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省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周总理对先生的生活、健康一直很关心。1954年,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后返回,途经西安,曾在人民大厦亲切接见了德涵先生,并将他营救西路军的事迹,向当时的省长赵寿山作了介绍。1958年5月20日,马德涵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0岁。

1978年10月,时任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同志曾给陕西省委统战部批示:“马德涵先生于1937年受敬爱的周总理委托,同马步青谈判释放西路军人员,做了很多工作,以后他一直同党保持联系,做了一定工作。”德涵先生的一生,是鞠躬尽瘁、致力爱国民主运动和革命工作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后人缅怀!



## 东城门楼上的 抗日军校

□ 封五昌

1936年8月，在西安东城门(长乐门)的城楼上有一所军事学校，这就是张学良将军和中共秘密协商创办的“抗日军校”。当时，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十七路军)进行监视，并镇压陕西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张学良将军为了培养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军事干部，特成立这所军校，也是张学良将军和中共合作的重要事项之一。为了掩人耳目，把这所“抗日军校”公开称为“学兵队”。

这所学校的领导人是张学良将军的副官长谭海，人们都称他“谭队长”。教员主要由中共中央从延安派遣来的几位红军干部担任，负责教育和训练工作。

学员约有300多人，绝大多数是北平、天津地下党选派的进步学生，以及东北流亡学生。他们学习抗战理论和军事战术。训练的目的在于改造思想，培养一批有理论、有战术的军政干部，准备抗日。

训练开始时，张学良将

军亲临东城门楼上，对学员讲解抗战理论和军事知识。他很沉痛地说：“日寇占领东北，蚕食华北，亡国灭种，就在眼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祖宗留给我们的江山，是要我们做国家的主人，不是要当奴隶。”鼓励学员要学好理论知识和军事战术，为收复失地贡献力量；并批判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以及抗日“准备论”等等谬论。对于联共问题，只向少数骨干加以说明，对一般学员只讲到停止内战为止。由于张学良将军躬亲领导，队长教员主持讨论，这就对学员加强了抗日政治思想教育，逐步明确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依靠力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软禁不归。不久，东北军调离陕西。学兵队由原总部秘书郭维城带领去彬县太山庙转入红区。

张学良将军培养的这批学员建国后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骨干，如革命老同志谷牧、郭风、乔小光等都在这所学校学习过。

## ●史料钩沉●

从两晋时期开始,国家出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虑,根据当时佛教发展的状况,相对应佛教采取或扶植或限制的政策。随着佛教僧侣人数的增加,经济势力的增强,在社会各阶层中影响力的扩大,也会与封建国家、世俗地主阶级发生矛盾。以皇帝为首的朝廷如果不能用和平手段消除矛盾,就会采取十分激烈的行动。传统上认为,历代王朝针对整体佛教进行武力镇压的事件,总共发生过4次,这就是习称的“三武一宗灭佛”。“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后周世宗。“灭佛”就是毁灭佛法、佛教典籍,一般称之为“法难”。实际上,这4次所谓“灭佛”事件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是要彻底消灭佛教,有的只是要压缩佛教僧团的规模;有的是只打击佛教,不

涉及道教,有的则是佛教、道教一起打击。

### 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423~452)“灭佛”,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国家镇压、取缔佛教事件。

北朝(420~581)大多数帝王支持佛教,促使佛教势力迅速发展。同时,佛教也与儒教和道教发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僧团与国家及世俗地主阶级也发生了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太武帝对佛教采取镇压措施,正是这些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

北魏太武帝原来信仰佛教,也尊敬僧人。但是,他逐渐看到,佛教的大发展与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冲突。因为,僧人具有不负担兵役、徭役,不缴纳租调的特权,由此导致了佛教与国家争财富、争人力。所以必须控制僧人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魏太武帝继承前代的

政策,重用儒者,尊崇儒家学说,以便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同时,他又接受司徒崔浩的劝告,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奉寇谦之为“天师”,建立天师道场。他还亲自登坛受符书,改元“太平真君”。这一系列举措,都是在为打击佛教做准备。

太平真君五年(444),

# 中国古代的“灭佛”事件



太武帝下诏限制佛教，认为佛是外国的神灵，所讲的道理是荒诞的，无益于政化，并且禁止王公和百姓私养沙门。太平真君七年(446)，他出兵经过长安，发现一所寺院中私藏兵器，怀疑僧众与起义军通谋，下令诛杀寺里的僧人。后来又发现寺院中存放酿酒器皿和财物，发现洞窟中藏匿妇女等，于是他听从崔浩的劝说，颁布取缔佛教的诏书。



太武帝镇压佛教措施非常残酷，不仅不分老少坑杀所有沙门，对于信仰佛教，制造泥、铜等各种佛像的人，也要屠杀。经过这次灭佛运动，北魏境内的大量僧尼遭诛杀，寺院被拆除，经像被焚毁，劫后余生的僧尼逃奔南方。

六年后，太武帝死，文成帝即位。文成帝认为佛教讲的道理正确，有助于国家的治理，有益于人们仁智善性的增长，于是解除了佛教禁令。此后在历代北魏帝王的支持下，佛教在北方又获得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

### 北周武帝“灭佛”

北周武帝(561~578)统治时期，北方佛教势力急剧膨胀，僧尼人数达到200万，佛寺3万多所。由于僧尼享受免税赋徭役的特权，武帝要富国强兵以统一北方，就必然采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措施。周武帝首先削减僧尼和寺院数量，又多次召集名

儒、名僧和名道，共同讨论儒释道三教的优劣。

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下令禁断佛教和道教。这次灭佛与上次有几点不同。第一，北魏太武帝只取缔佛教，对道教予以保护，北周武帝则是对佛教和道教都予以禁止。北周武帝原来打算保存道教，但是道教和佛教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对朝政有危害，所以采取两教并废的措施。第二，虽然毁坏了一些寺院，焚烧了一些经像，但是并不屠杀僧尼，而是勒令他们还俗为民。对于有些地区的寺院，并没有拆除，而是分别赏赐给王公，作为他们的住宅。第三，设立“通道观”。从佛教和道教名人中选取120人为学士，让他们讲《老子》、《庄子》和《周易》，目的是会通三教。显然，让佛、道两教人士会通三教，在于强调儒家的重要性。

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又下令在原来北齐境内禁断佛教和道教。促使许多僧人逃往南方，境内僧尼奉佛也只能在秘

## ●史料钩沉●

密状态下进行。宣政二年(578)周武帝死,宣帝、静帝相继在位期间,朝政由外戚杨坚把持,下令允许佛教流行。到杨坚废周建隋,开始大力发展佛教。

### 唐武宗“灭佛”

由于唐代前中期的帝王基本都支持佛教发展,促使佛教势力急剧膨胀,激化了佛教僧侣阶层与国家和世俗地主阶级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唐武宗时期的毁灭佛法运动。

到唐武宗(841~846)即位时,由于僧尼数量的增长,寺院经济的膨胀,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促进了社会上反佛情绪的高涨。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也决定取缔佛教。他在废除佛教的诏书中,历数佛教的危害,认为,在全国各地,包括两京地区,“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他还认为,废除佛教,乃是“济人利众”的举措。

武宗的灭佛运动是逐渐展开的。会昌二年(842),他命令僧尼中的犯罪者、违戒者,全部离开寺院还俗,并且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徭役。会昌四年(844)七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拆毁那些房屋不到 200 间,没有敕额(皇帝所赐的匾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到了会昌五年(845),武宗发起的灭佛运动达到高潮。当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为全面取缔佛教做准备。四月,在全国

范围内实施废除佛教的措施。四个月后,宣布灭佛的结果:全国共拆除大的寺院 1600 余所,小的寺院 4 万多所,还俗僧尼 260500 人,都充两税户,没收的良田数十万顷。另外,把寺院奴婢收为两税户的有 15 万人。

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甚至由此改变了佛教发展的走向。由于寺院被拆毁,寺院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扫荡,僧尼被迫还俗,经书典籍散失,以义理研究为特点的一些佛教宗派丧失了繁荣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形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佛教经院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理论创造的旺盛阶段,从此就结束了。以山林为基地的禅宗逐渐发展起来。

### 后周世宗“灭佛”

按照传统的说法,后周世宗(954~958)被列为最后一个“灭佛”的皇帝,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相提并论。实际上,他只是力度比较大地整顿和限制佛教,并没有计划完全废除佛教。

五代十国(907~960)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战乱的年代。由于当时的历代小王朝为了抗御外地,保住疆土,都把扩充兵员,增强国家财力作为首要任务。所以,各王朝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的措施。周世宗即位之后,在挫败北汉和契丹联合进攻的同时,对佛教采取大规模压缩的措施。显德二年(955),诏令禁止私度僧尼,严禁奴婢、罪犯等出家,废除所有无敕额寺院。不允许新建任何大小寺院。他没有勒令所有僧尼还俗,但是鼓励僧尼还俗。

## 西安古城墙之明西安城军事布防

**统兵官署** 明西安城为西北地区军事政治重镇,又是秦王藩府驻地和陕西省省会所在,因而明统治者十分重视西安城的军事防卫,府城内屯驻重兵,并驻有各级统兵官署。

**陕西总督署** 明陕西最高军政长官衙署。明总督之设,起于代宗景泰年间(1450—1456)。当时因用兵而于一省或数省置一总督提督军务,总兵、巡抚而下,皆听其节制。因总督为军事而设,故其加衔中央兵部尚书、侍郎;又因需要行使监察权,以监察地方,又加都御史之名。陕西设置总督,始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当时西北用兵,设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以左都御史王越任之,节制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军务。十五年(1502年)以后,

或设或革,至嘉靖四年(1525年)始定设。据吴廷燮《明督抚年表》载,明代先后任陕西三边总督者有六十二人。陕西总督始开府于固原(今宁夏固原),防秋(古代北方每至入秋,边塞经常发生战争,届时边军特加意警卫)驻华马池(今宁夏盐池县),后移驻西安。陕西总督府址在今东大街端履门西侧东木头市街东段路北。

**陕西巡抚署** 明陕西省级军政长官衙署。巡抚之名,起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当时秦王朱棣在陕横行不法,被召回南京,禁锢宫中,明太祖遂派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派尚书蹇义等26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各省专设,自宣德五年(1430年)始,由中央朝廷派给

周世宗在限制佛教的过程中,还专门下令革除佛教中的一些旧弊端。他规定,对于以前有些僧尼采取的烧臂炼指、钉截手足等“诸般毁坏身体”等做法,一律禁止。那些“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都是聚众蛊惑人心,“今后一切禁止”。

周世宗限制佛教的结果,是后周境内的寺院毁废了30336所,仍存2694所,登记在册的僧尼有61200人。周世宗限制佛教的政策,力图把佛教规模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的

目的,革除某些佛教陋习的措施,对以后的宋代统治者都是有启示作用的。周世宗之后,历代王朝没有再对整体佛教采取过激烈打击的政策。

“三武一宗”之类的事件,对佛教僧团规模的变化,对佛教寺院经济实力的消长等,会产生剧烈的影响,但是一般持续时间都不很长。但是,对于佛教思想的演进,对佛教修行方式的转变,对佛教徒的自我认识和定位,此类事件的影响都是很深远的。

## ●西安风情●

每省一名或数名巡抚。明代先后出任陕西巡抚者约 110 人。明代巡抚虽非正式地方大吏，但事实上与总督同为省级地方最高长官，掌握着本地区的军政大权。陕西巡抚驻署西安，防秋驻宁夏固原。明末天启元年(1621 年)十二月，陕西巡抚曾移驻汉中。西安巡抚署衙在西安城西大街鼓楼之北的“北院”。该署院初建于明宣德七年(1432 年)。嘉靖二十一年(1542 年)增修。[乾隆]《西安府志》卷十五载：“嘉靖二十一年巡抚赵廷瑞新后堂，辟后轩为北向，前作思济亭于五柏之间，又曰五柏亭。建楼七楹，额曰‘仰辰’，翼以两厢十楹，葺节镇坊。导通济渠由西垣入，东垣出，左右亭各一。”这就是今天北院门西安市人民政府大院明代初建时的规模与建筑式样。

**都指挥使司署** 明陕西省级常设统兵官署。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分化省级地方事权，于洪武九年(1376 年)废除了元代以来行中书省丞相独掌本省军事、行政、财政和司法各种大权之制，改设为地方三司，将其权力一分为三，以承宣布政使司管民政与财政，提刑按察使司管司法，都指挥使司管军事。三司各自独立行事，互不统属，分别归中央有关部门管辖。陕西都指挥使司，简称陕西都司，为省级地方机构之一，上隶于中央右军都督府，而听于兵部。设长官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掌一方之军政，统率卫所军队。下设都指挥同知二人，从二品；都指挥僉事四人，正三品。其属有经历司、断事司、司狱司、仓库、草场等。陕西都司下领陕西、甘肃、宁夏三十卫、十七千

户所、四仪卫司、三群牧司。陕西都司衙署在西安今东大街中段路南东厅门街西段路北。

**陕西总兵署** 明陕西统兵武官署。明制，总兵官，副总兵，无品级无定员。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总兵本为差遣的名字，遇有战争则命将充总兵官，调领卫所军队，事毕缴还。后逐渐演变为常驻武官。宣德(1426—1435)设镇守陕西总兵官一人，总镇今陕甘地区，下领分守副总兵一人，分守参将五人，游击将军四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八人。明陕西总兵署在今西安东县门街西段路北。

**陕西参将署** 明陕西统兵武官署。参将位在总兵、副总兵之下，游击将军之上，无品级，分守各地。明陕西总兵下设分守参将五人，即陕西参将、河州参将、兰州参将、靖虏参将、阶文西固参将。明陕西参将署在西安府城东南隅，万历元年(1573 年)建。

除以上陕西地方军事统兵官署之外，西安府城内还有秦王府护卫军各级官署。明代坐镇在各地的藩王，“分封而不裂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明史稿·诸王》）。其地位虽高，而不能干预地方政事，但却拥有一定的兵权，各亲王都拥有自己王府三千至数万人的护卫军。明秦王府护卫军的衙署有：

**王府护卫指挥使司署** 明秦王府护卫军长官衙署。洪武五年(1372 年)置，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等。《明史·职官志》王府护卫指挥使司：“护卫，掌防



御非常,护卫王邸。有征调则听命于朝。”明制每王府设三护卫,每卫设左、右、前、后、中五所,所千户二人,百户十人。洪武初秦、晋、燕三王府护卫各一千数百人。十年(1377年)正月,明太祖“以是三府者皆临边阨塞,欲厚其势以捍外侮耳”,于是以羽林军各增至二千二百人。秦王府护卫指挥使司署位在秦王府城“萧城”内,旧址在今西安城东北隅。

**西安右护卫署** 秦王府右护卫军指挥使官署。明初定制诸王府皆设三护卫,卫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治二人,从三品等。宣宗时秦王朱志壑曾辞三护卫,诏留一护卫。西安右护卫上隶秦王府护卫指挥使司,下领左、右、前、后、中五千户所,职在护卫王府。署址在秦王府城外西墙之侧,旧址约在今北大街西五路西端路南。

**二、兵力部署** 明朝的军队是按“卫所”制度编制的,规定五千六百人编为一卫,长官为卫指挥使。每卫下设前、后、中、左、右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编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为千户。每千户所下设十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编一百一十二人,长官为百户。每个百户所领二个总旗,每个总旗编五十六人,长官为总旗。每总旗领五个小旗,每小旗设小旗一人,旗兵十人,计十一人。按此编制,“大小联比成军”。

明朝的卫所军队,除守卫京师的禁卫军“京卫”外,其他均驻守镇戍在全国各地,其分布的原则是“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其统辖关系是“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

(《明史·兵志》),即各地的卫所官兵,分统于本省的都指挥使司,再上隶于中央的五军都督府。明代时期,陕西都司上隶于中央右军都督府。

明代驻防在西安城的卫所军队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归陕西都司统辖镇守西安城的军队,另一是归秦王统领的秦王府护卫军。

明代隶属于陕西都司职在镇守西安城的军队共有四卫,即西安左卫、西安右卫(后改西安中护卫)、西安前卫、西安后卫。每卫各有五千六百人,兵力合总二万二千四百人。明代后期略有增加,如明末崇祯时陕西巡抚孙传庭说:“西安四卫,旧有屯军二万四千”(《明史·孙传庭传》)。每卫设指挥机构卫指挥使司,各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指挥佥事四人,正四品;镇抚司镇抚二人,从五品等。每卫下统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西安四卫分驻于西安城内的四隅,以固守城防。其中西安左卫署设在今西安城东南隅,旧址约在今西安建国路附近,今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有明“西安左卫”楷书字砖;西安前卫署址在今西安城西南隅四府街左右,西安后卫署址在今西安城东北隅解放路北段左右。

西安四卫分区驻防,而相互协防,统一接受都指挥使的指挥制约。四城门分派士兵日夜把守,负责严查进出城门车辆人等与早晚启闭城门。夜禁以后,每门两名武官领队,持更牌,更箭骑马查考巡夜。秦王府护卫军职在护卫秦王府安全保卫,兵力部署主要集中在西安城东北隅秦王府城内外。

# 南院门

□ 彭栋为



老凤祥

南院门位于西大街东段南侧，以有南院而得名。清顺治元年(1644年)，陕甘总督部院行署始建于此，光绪十四年(1888年)，陕西巡抚叶伯英重修之，因其与鼓楼之北的北院门南北相对位处于南，故名南院。一般百姓则把南院南面的东西向街道称之为南院门，至今沿用。

南院门繁华于清光绪年间后期。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等仓皇逃奔西安，曾驻蹕南院。随驾西来的王公大臣，许多人也暂居于此，而大商行、大银号等业，也应运而生，竟至形成一时之畸形繁荣局面。民国初年，这里更是店铺林立，人口集中。诸如照相、洗浴、理发等服务业，以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瓷器店、

绸缎庄、首饰铺等应有尽有，正如民间流传所谓：“老九章(绸缎呢绒等)，老凤祥(金银首饰)，南华公司卖洋糖，还有‘五洲’、‘世界’大药房。”形成西安城内规模最大的商业区。

现在的南院则为中共西安市委所在地。自1954年起，南院门前的盘道空地，被辟作街心花园，内植各种花卉树木，煞是宜人。近年来，旧城改造工程也不断在南院门附近展开，一些老字号或迁移或逐渐消失，高大建筑已成为这一带的新景观。



# 大唐不夜城——西安曲江模本新标榜



贞观广场由曲江电影城、西安音乐厅、西安美术馆合围而成

怎样形容一个城？“要有内容，要有产业内容，用丰富的产业形态，无数个项目，是八仙过海的项目来撑起来，这才是一个城的概念，这就是大唐不夜城，叫它城，城就是最富有生命和活力的人的家园。”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大唐不夜城建设总指挥李元这样说。国家级文化艺术中心，国际化演艺娱乐平台，世界级文化商贸巨擘，亚洲最炫美盛唐天街。2007年，李元为《西安曲江振兴模本》接受媒体采访时，已有对大唐不夜城的辉煌展望。2009年9月28日，大唐不夜城耀世开城，曲江从大雁塔北广场、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完成了一系列的城市文化复兴之路。

大唐不夜城总占地面积达到57万平方米，建成面积达35万平方米。总投资额将超

过60亿元。开城当晚，就接待了大约16万游客。“预计大唐不夜城每年将吸引约2600万市民、游客。年产值将超过10亿元，每年税收达到2亿元以上，成为整个曲江新区的价值核心。”李元介绍说。每晚22点过后，整个广场，雁塔南路还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大唐不夜城圆了西安的文化梦想。”西安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总策划师韩骥说，“80年代从国外考察回来，就有个梦想，希望西安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城市。而要达到这个标准就必须既具备传统的风貌又要具备现代旅游所必需的非常完善的旅游设施和休闲场所。只有这样才能不被仅仅作为旅游的过站，而真正成为旅游的目的地。”

## 雕塑广场

全长1500米、宽480米的中央雕塑景观步行街，据说是亚洲最大的景观大道。玄奘广场、贞观广场、开元广场由北向南依次布局。分列其上的五大铜铸雕塑群体形成了大唐不夜城的景观中轴线。贞观广场由音乐厅、美术

## ●西安风情●

馆、电影院三大场馆合围而成,贞观之治群雕位于贞观广场的核心位置。中心人物唐太宗骑战马的雕像高 17.95 米,营造出纪念碑式的恢弘气势。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项秉仁是贞观广场的总设计师。“建筑与景观应当是协调统一的,而这些宏伟壮观历史沉淀的雕塑群在延续盛唐风格上非常成功,与广场气质相得益彰。”项秉仁动情地说,“对我而言,这个广场就像自己的儿子,不能让每一个市民,每一个游客在这里都能有所收获是我最关心和在意的。”

### 三大场馆

西安音乐厅、西安美术馆、曲江电影是大唐不夜城的大型公共场馆工程,总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西安音乐厅有可容纳 1300 名观众的大型交响音乐厅以及两个小型室内音乐厅、流行音乐厅构成。声场设计是由声学界的诺贝尔奖——“赛宾奖”得主哈罗德·马歇尔博士担纲,声场效果堪比北京国家大剧院。开幕季的三场演出:小约翰·施特劳斯交响音乐会、香港风华国乐音乐会、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连续演出 10 天,却一票难求。工作人员小杨说:“真心期待能和每一个市民分享音乐的快乐。”12 月 26 日,谭盾将携《奥运序曲》、

《卧虎藏龙》和《纸乐》执棒西安音乐厅。他说:“在世界上,能够让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结合得如此完美,唯有西安能够做到,唯有西安音乐厅能够做到。因为这里厚重的历史文化,其他地方无法拷贝,无法复制。从现在开始我必须全力备战,不是因为害怕届时敷衍观众,而是因为害怕届时会亵渎这个地方。”

### 商业街区

大唐不夜城最大的商业项目——西安新乐汇,是世界 500 强之一的美国华平集团斥资 1.3 亿美元打造的集餐饮、娱乐、购物于一体的大型体验式商业街区。西安市副市长、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段先念说:曲江新区倡导爱商、扶商、助商的大招商理念,与商共生、共荣、共赢的担当,以及“文化+旅游+商业”的发展模式。大唐不夜城更是深化了这一模本。在与华平集团谈判的过程中,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李元作为曲江新区招商领导小组组长,谈起这次招商还是很激动:“我们谈得很诚恳,首先不能走,不能撤资!你需要政府和我们做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我们能不能打造一个一流的服务。政府服务的创新平台,要把政府的服务往前走,不光要实行一站式办公,而且要一站式服务,管家式服务。”与美



## 西安市区县第二轮修志 经济部类志稿研讨会召开

西安市区县第二轮修志经济部类志稿研讨会于 2009 年 10 月 28 日至 30 日在碑林区召开，市属 13 个区县的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主编、业务骨干及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有关人员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市志办区县志处处长彭栋为主持，碑林区委常委、副区长邹晓刚代表碑林区委、区政府向会议致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姚敏杰到会讲话，省地方志办公室副巡视员兼市县志处处长王新中

应邀参加会议研讨并作指导性讲话。

这次研讨会主要围绕第二轮修志经济部类志稿编写中的篇目内容优化、创新，改革开放的如何记述，怎样完整反映经济部类事物的整体面貌与兴衰起伏，对上届志书不曾终结，本届志书又正继续演进发展之事物的如何追述以及图表的设计运用诸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切磋、交流。与会同志发言有的放矢，气氛热烈，取得了预期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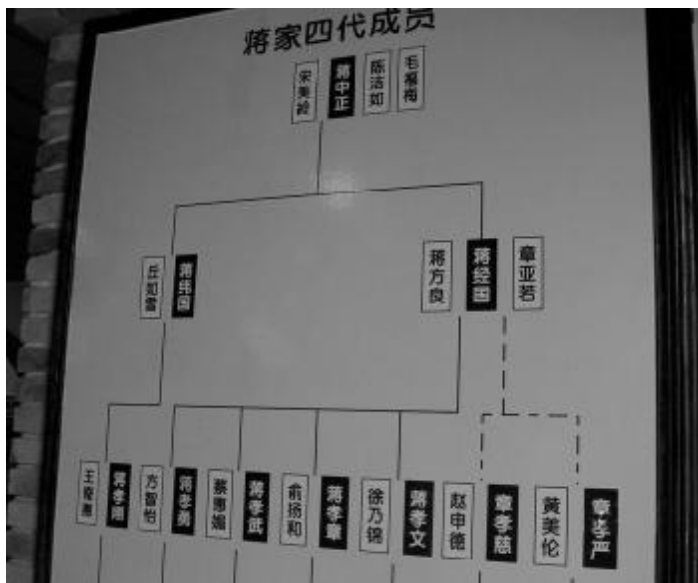
国华平集团的洽谈，整个政府的创新服务平台事先的搭建，坚定了华平集团在大唐不夜城一次落单 1.3 亿美元的投资，也成为西安市历史上最大的招商项目，同时省政府也颁给了华平 300 万元的奖金。现在新乐汇商业街区已吸引了超市、酒吧、餐茶等商企 200 余家。而西安音乐厅、西安美术馆、曲江电影院也都分别组建了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的公司进行管理运营。三大场馆的顺利开馆，也是曲江商业模式、机制创新的结果。

### 大唐群英谱，盛唐繁荣景象的全面展示

2009 年 7 月，国务院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强调：“振兴文化产业，必须坚持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曲江新区作为第一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大唐不夜城适时凸显了曲江的深厚文化底蕴，成为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新标杆，丰富了城市的公共空间，还有无限广阔的艺术空间和市场空间。著名音乐家赵季平说：“就艺术创作和娱乐休闲而言，在全国很难找到像大唐不夜城这样体量巨大、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在这里每一个人可以通过一砖一瓦得到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和精神享受，这真的是一个盛世文化的标志性复兴巨作。”

# 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



清朝人编修族谱常有“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之说，将家谱与国史类比，用众人皆认可的国史地位来凸显家谱身价，以张扬族谱。族谱同国史类比，体现在：国家修史有制度，宗族修

谱有习惯和规约；国史、族谱均笃信“信今传后”的理念，不过国史善恶并书，族谱隐恶扬善，迥然有别；国史、族谱的功用有共同点，即叙彝伦，维人道，均是教化工具，不过国史侧重“鉴治乱、示惩劝”，族谱研

讨人生经验，寻觅光耀门庭的路。族谱犹国史见解，释放出民间有史书、民众有历史的信息。民间修家谱是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应当珍视，值得大书一笔。

·知识窗·

## 中国唐装的由来

“唐装”的称谓，其实源于海外。唐代盛期，声誉远及海外，因此以后海外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现在大陆所称的“唐装”并不是唐代的盛装，基本上清末的中式着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从边开衩、滚金边、立领等一些细微处都可以找到绸缎马褂的痕迹。它的一大特点就是穿着者没有明显的年龄界限。穿着唐装，既显富贵休闲又不失妩媚俊秀。而现在时尚流行的服装中大多都有中装元素的细节体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生活中选择中装来装扮自己的生活。





## 对入志图照的几点思考

□ 王耀珍

图照包括地图、示意图、照片、拓片等。图照是通过具体形象反映客观事物的,富有立体感和时限感,它比文字更为直观、生动、真实。图照作为无言之史,也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和审美价值。首轮志书几乎没有一部不在志首设置若干图照,但由于对图照入志的效用认识不足,许多在志书撰写总体规划中,没有给图片以足够的重视。撰写前未广泛搜集有价值的图片资料,没有很好发挥图照特有的视觉作用。首届志书在图照搜集、选用、编排印制上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吸取,二轮修志已

经展开,如何有效地运用图照,对提高二轮志书的质量至关重要。本文拟就入志图照谈一些自己粗浅看法,以求教于方志同仁。

一、图照应纳入篇目设计之中

图照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记录地情的一种特殊载体,应和志书的整体结构一致。志书中配置的图照种类、内容是由志书的篇目框架安排决定的。在首轮修志时,许多地方由于入志图照未纳入志书总体设计之中,当修志工作启动后,志办下达到各单位、各部门的修志任务仅为文字资料部分,

所以各专业志在交稿时很少有图照方面的资料。各单位各部门在搜集文字资料时,即便遇到很有价值的图照资料,但也未必予以重视,当后期要求他们提供图照时,许多单位修志机构已解散,即使不解散,势必浪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一些具有一定时限性的事物是再也照不到它的原貌,例如:一些重要街道的拓宽改造;计划经济时期建的大商场、大饭店等,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它们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但它们的原貌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许多志书只有现貌,缺少原貌,没有新旧对比,难以体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轨迹。责编后期找照片,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到出书前只能根据搜集到图片数量来确定志书中图照的配置。首轮志书由于前期没有总体构思,志书图文并茂完美效果达不到,不能不说是首轮志书一方面的遗憾。

鉴于此,二轮志书在篇

## ●理论研究●

目设计时,就要同时考虑到图照的设计,确定入志图照的类型、数量、方式、主题、总体篇幅占志书的比重,以最大限度地促使志书从图照到文字达到完美的结合。在志首设概貌从宏观到微观,从总体到局部去安排。在续修工作启动时,把文字与图照征集任务同时布置下去。如果各单位都能按预期的设想去收集,就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反映一地之全貌。地方志部门要确定一二名具有一定美术、摄影等方面特长人员担任图片编辑,负责图片的组稿、拍照,各种图的绘制,彩页、护封版面设计等工作。有些事物时间性比较强,例如重要的会议,大型的重要活动,有些可能会被拆迁的具有时代性的建筑,志办应尽快组织适时去拍照,不能等到需要用图片时才去找,就又晚了一步。在记述旧城改造时,我们可辑录城市道路、房屋新旧对比的照片,其效果会胜过文字的记述。由于续志是断代志,断限内

的图片是这一时期社会变迁的写照和见证,而许多事情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因此照片的辑录和收藏已经完全成为现实和可能。

二、图片搜集来后要精心的鉴别和筛选

无论卷首、卷中、卷尾,还是插图、插页、附照,都要根据需要选择取舍。

首轮志书,只重视政治性的图片,忽视社会性、文化性图片,千篇一律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的照片按顺序排在前面。另外楼、堂、馆所的照片用得多了些,如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办公楼等。二轮志书既要全方位、多角度反映该地地情,更要选用有地方特色、时代特点和存史价值高的照片。突出地方特色,要把当地自然风光、社会文化等方面特色形象直观反映出来,时代特色是志书的灵魂,在续志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文字应反映的主题内容,亦是图片反映的重点。一般来

说,入志的照片存史价值高,主要有反映一个地域自然地理、历史沿革、城乡面貌、风景名胜、风俗物产等变化内容,尤其是一些濒临灭亡的事物,正在消失,如一些古建筑,或即将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工艺、民间舞蹈、古民俗等,以及计划经济时期所使用的购货票证,因为这些事物不具有再生性,所以其存史价值更高。二轮志书要适当增加随文照片。首届志书比较重视文前彩色照片,随文照片较少。实际上,随文照片和文字记述结合比较紧密,史料性更强,而且随文照片一般是黑白的,安排灵活,印刷方便,造价也低,应更多地使用。

二轮志书在图片筛选时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真实性,必须客观反映事物,不能为美化地区或行政领导人的政绩而弄虚作假;二是一致性,要十分注意和文字的有机结合、完整统一,不能相互背离,也不能相互矛盾;三是系统性,图片不宜过多、过



杂,增加图片篇幅的基本标准在于叙事明理;四是艺术性,要注重图片的美观;五是时限性,要和志书记述的时限相吻合;六是照片的文字说明简明扼要。

### 三、图的种类应多样化

人志图按其内容来分主要有:行政图、地貌图、示意图、统计图等。首轮志书图较为单一。首轮在志书大多冠其首是疆域图,缺少定位图,这里所说的定位图,是指标明志书所记的某省、市、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省内所处的地理位置图,这种确定地理方位的图,我们便可以称之为定位图。其他地形地貌图、交通邮电图、商业网点图、文物古迹分布图几乎没有。有些图的比例尺、制图时间等要素不全。

续志应改变首届志书用图较为单一的缺点,在第二轮修志中要尽可能多地收集地图资料,诸如疆域图、城池图、山川图和各类分布图及各种规划图,图画包括书法篆刻、示意图、形象图,既搜

集已有的,也可根据需要自行设计绘制。把所有图收集来后,如何排列使用呢?在卷首应使用普通地图。何谓普通地图?普通地图是综合地反映当地自然、政治、经济一般特征的地图,它所含的要素多,用途广。作为志书的首图所含内容要丰富,它不仅应有行政区划的内容,而且还应该标有资源状况、农村牧场、水陆交通、河流、湖泊、沼泽、桥梁、山峰、景点、古迹等内容。定位图和首图或同占一页,定位图以插图的形式出现,或二图分占两页,定位图在首图前或后,为了鲜明,二图最好都是彩色图。在首图主图区外的空白处,除可设置定位插图外,还可以设置该区域“行政区划简表”和标明该县的地理坐标、人口、面积,这不仅增加了图的信息量,而且使所要表明的问题更为清楚明确和全面。一般在全局图后,可排列专题图。例如:地貌图、土地利用图、文物古迹分布图、旅游景点分布图、城市规划图等。

各图都要标明制图的时间,现已出版的志书除少数外多未注明制图时间,这有欠妥当。随着时间的流逝,任何事物都会此一时、彼一时,读者必须参考制图时间才能正确地了解图的信息。地图的使用必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执行,地图绘制要专业、规范,要正确使用比例尺,严格按地图上各种事物通常使用的符号进行正确标注。

总之,图照是一门专门学问,要运用自如恰到好处,并非一件容易事情,第一轮志书如此,二轮志书亦然。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吸取首轮志书运用图照不当的教训,在修志实践中不断探索学习,勇于创新,不断发展完善有关图照的理论并运用于修志实践中,充分使用现代所具有的高科技、声像传媒手段。只有这样,才会编出更多设置合理、图文并茂的高质量志书,从而提高志书的吸引力、扩散力,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效能。



清光绪末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避难到西安,曾在广济街口闻香停车,品尝了德懋恭的水晶饼后赞不绝口,并钦点为“贡品”,之后德懋恭水晶饼名价倍增。

德懋恭水晶饼是一种酥皮点心,因其饼馅晶莹透亮,犹如水晶而得名。是秦式糕点的代表。水晶饼源于宋代下邳县(今陕西省渭南市下邳镇),曾与燕窝、银耳、金华火腿齐名,元代已远销京、津各大城市。至清代末年,经渭南同义栈张采风技师改进精制,产品以“金面银帮,起皮飞酥,凉舌渗齿,清香爽口”而名声大振。当时,以桐木盒和硬纸盒精心包装,作为馈赠亲友的上等礼品。后来,流传到西

安,各糕点坊都仿制生产,但尤以西安德懋恭生产的最为正宗有名。

德懋恭食品店坐落在西安市西大街广济街口,始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该店为前店后厂,有着 100 多年生产水晶饼的历史。该店的水晶饼选料精良,工艺考究,风味独特。德懋恭水晶饼采用上等精白面粉、上等冰糖、精板油为主要原料,配以动物油、玫瑰、橘饼、核桃仁、青红丝等十多种材料作辅料,经制皮、制酥、制馅、成型、烘烤等 12 道工序,全部为手工精心制作而成。其成品小巧别致、皮酥馅足、滋润适口、层次分明、营养丰富,油多不腻,入口渗甜,且以浓郁的玫瑰和橘饼的清香

使人回味无穷。因其面色金黄,四周雪白,素有“金底银帮鼓鼓腔,红色印章盖

## 中华老字号

### 德懋恭水晶饼制作技艺

(富小云整理)

中央”的赞誉,被称为“秦点之首”。加之包装考究,设计美观大方,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所以,每逢喜庆佳节,群众争相购买,成为当地人和外地旅游者孝敬老人、馈赠亲朋的上等礼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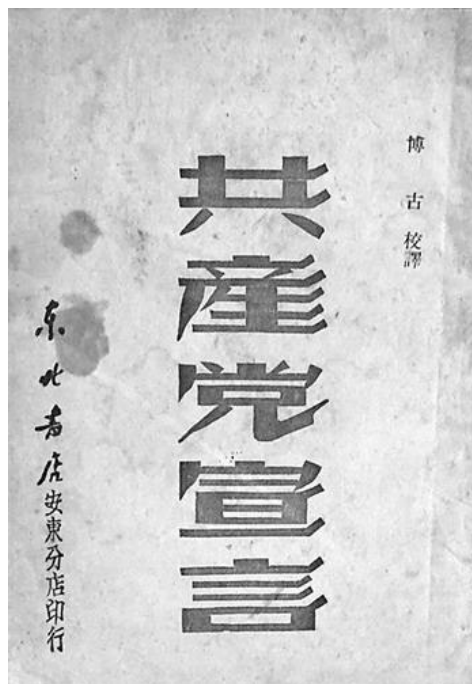
2007 年 5 月,中华老字号德懋恭水晶饼制作技艺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西安市第一批(33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 毛泽东一生读过哪些书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读过的书难以统计，但大体上讲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马列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笔记》(节译本)、《列宁选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等。

二是哲学、经济学著作。哲学类包括：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



哲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和《哲学与生活》；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以及西方近代哲学家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过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艺术论》，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经济学著作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河上肇的《马克思



## ●文史拾趣●

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此外,毛泽东还读过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著作,以及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等。

三是中国历史和近代时政著作。包括:《御批历代通鉴辑览》116卷、《二十四史》、《史记》、《资治通鉴》、《老子》、《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读通鉴论》、《廿二史札记》、《曾文正公家书》和《曾文正公日记》、《盛世危言》、康梁的维新变法著作以及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毛泽东还有一个习惯,到了外地,总要看省志和县志等地方性史书。

四是中国文学著作。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古代诗词。自《诗经》始,我国历代的诗词曲赋,毛泽东几乎广泛地阅读过,最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第二类为古文和



- 36 -

古典小说。对古文,他最爱读六朝的骈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在古典小说方面,他几乎将所有名著都浏览过,并对一些名著提出自己的见解。第三类为现代文学,主要是读鲁迅的著作。20卷本《鲁迅全集》他放在办公桌上经常阅读。圈圈划划,不断批注。直到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上、书架上,还摆放着新出版的大字本《鲁迅全集》。第四类为笔记小说和其他杂书。包括《智囊》、《笑林广记》、《官场现形记》、《聊斋志异》等。

五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著作。包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汤姆生的《科学大纲》、普朗克的《科学到何处去》、秦斯的《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的《物理世界的本质》。毛泽东还爱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动物学》杂志、《考古学报》、《化石》杂志等这样的刊物,关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晚年,毛泽东接见杨振宁、李政道时还同他们讨论粒子的可分不可分和宇宙守恒不守恒问题;直到1976年,毛泽东还索要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此外,毛泽东还读了一些宗教、逻辑学方面的书籍以及工具书。宗教方面的著作如《金刚经》、《六祖坛经》,逻辑学方面的著作如《穆勒名学》,工具书如《辞海》、《辞源》等。

## 古人的“记事本”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每当人们需要记录或提示备忘时，会想到使用记录本。但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则没有如此便利的书写工具。因此古人采用的记录和备忘方式，也与今人有很大的差别。

在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每逢朝廷举行上朝仪时，臣僚手中所持的“笏”，就具有记录和备忘录的功能。

“笏”的历史十分悠久，它源于西周时期



的“圭”。圭亦称玉圭、圭璧，这是一种玉制的长条形板，上端呈圆状，下端呈方形。按照西周礼仪制度的规定，圭是帝王、诸侯在祭祀时或诸侯觐见帝王时，手中所持的“礼器”，也是帝王分封诸侯的信物。“圭，瑞玉也，上圆下

方。圭以封诸侯，故从重土。”(许慎《说文解字》)可见“圭”为两个“土”字相叠，就在于分封诸侯的形式是“分土封疆”。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下，因身份、地位的不同，帝王赐封诸侯的圭也有区别。“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命圭。”“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周礼·考工记·玉人》及郑玄注)这些圭的名称和大小各异，就是为了区分受封者的身份和地位。在举行祭祀、朝聘等礼仪活动时，圭实际就成为持有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自秦朝以后，“朝礼”仪式不再仅仅是臣僚觐见天子，而是君臣共商军国大事。原来“朝礼”中所持的圭，随之失去作为礼器的功能，而被象牙或竹、木制的“笏”所替代。笏，亦称朝笏，俗称手板。笏的用途，除作为上朝时显示臣僚身份外，还用于指划或记事。“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刘熙《释名·释书契》)“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礼记·玉藻》)若帝王有圣谕，则可以随时在笏上记录。如臣僚入朝有事上奏，还可以用于备忘录。即事先在笏上书写需上奏的事宜，届时以备提示之用。可见笏作为臣僚上朝时携带的物品，其功能和作用是记录或提示。

笏也因官品的高下，有形制的差别。“笏，



衣绯紫者以象，上诎下直；服绿者以槐木，上诎下方。其制无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长阔。皇佑间，极大而差薄，其势向身微曲，谓之抱身，后复用直而中者。其木笏始亦甚厚，今则薄，又非槐。”(王得臣《麈史》)“衣绯紫”、“服绿”都是指唐朝官服的颜色。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袍，四品、五品官员穿绯色袍，六品、七品官员穿绿色袍，八品、九品官员穿青色袍。五品以上官员手持的



笏为象牙制作，笏上部稍有弯曲，下部平直；六品以下官员手持的笏为槐木制作，笏的上部亦弯曲，下部呈方形。尽管不同品级的官员手持的笏在大小和形状上存在差异，但作为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却是每位官员必备的。在以后的历史中，笏的形制又有变化，但其功能和作用始终没有改变。

除用于记事和备忘外，笏也因其比较厚重，曾被用来打人。唐德宗时，原凤翔陇右节度使朱泚叛唐。“太尉段秀实以笏击逆臣朱泚不忠，反遭其祸。”(马缟《中华古今注》)

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作为人们服饰的“绅”，有时也可以被临时用作记事。

古时，人们穿着交领服装时，须将左右衣襟在胸前相交，再于腰间系带，以固定衣襟，防止散开。因材料不同，带有革带、大带之分。其中大带，是丝织的腰带。系戴时，从后向前围于腰间，然后于腹前系扣。系扣后，垂于结下的丝带就称为“绅”。“绅，大带也。”“古有革带以系配拔，而后加大带，绅则大带之垂者也。”(许慎《说文解字》及段玉裁注)“绅”在中国古代不仅作为一种装饰，由于它是丝织物，亦可作为书写的材料。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子张就是在绅上记录下老师孔子的教



海。

不过,绅因是古人日常的服饰,只能偶尔为应急而作为纪录之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绅”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人士的服饰和装束。因此,“绅”也与地位和权势有不解之缘。“绅士”或“士绅”,于是便成为为官者的代称。有绅和笏,而束绅者又多为文人,故“绅士”或“士绅”亦指文人学者。

古代朝廷官员上朝时,必有绅和笏,故这两者之间也有内在的联系。官员退朝后,笏就插在腰间的大带里。插笏于带,又称为“绶”,亦作“搢”。所以,“绶绅”又通常作为高官的代称。明朝以后,“绶绅”则专指曾在朝廷做官,现已退居乡间的人。



## 勾践曾卧薪是谎言

《左传》和《国语》是现存最早的记载吴越争霸和勾践事迹的历史典籍,距当时的历史较近,但都没有讲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事情,这不能不让人生疑。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说:“吴既赦越,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司马迁并没有详细提及“卧薪”。

最先把卧薪、尝胆连在一起用的是苏轼。他在《拟孙权答曹操书》这个带有游戏色彩的书信中,说孙权曾“卧薪尝胆”。真正把卧薪尝胆用在勾践身上的是文学作品。明末传奇剧本《浣纱记》,梁辰鱼大量描写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多次提到,这些文学作品让故事广为流传。

也有学者认为,东汉时期《吴越春秋》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中就有越王勾践卧薪的记载。文中说勾践“苦身焦思,夜以继日,用蓼攻之以目卧”。蓼,植物名,味辛辣,比喻辛苦。那时勾践日夜操劳,眼睛十分疲倦,就想睡觉,即“目卧”。但他用“蓼薪”来刺激眼睛避免睡觉。卧薪、尝胆分别是让视觉和味觉感到苦,后人把卧薪说成在硬柴上睡觉,是曲解了《吴越春秋》的意思。

## 词语印记一甲子

新中国迤迤走过了一个甲子。一个个历史时段,留下一串串带有时代印记的词语,其中透露着历史进程的轨迹和趋向,透露着观念意识的嬗变。而且,不难发现,我们的语言长于形象思维,不时出彩,永不平庸。

新中国从旧中国浴火而出,彻底埋葬剥削制度,是其根本理念。那时“周扒皮”和“半夜鸡叫”尽人皆知,它们鲜明生动地代表了农村剥削阶级的形象和行为。新中国的家底被伟大领袖概括为“一穷二白”。坏事可变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思变心切,不满足于“前进”的一步一个脚印,于是有了“跃进”乃至“大跃进”的说法和做法。“多快好省”写入总路线,它考虑周全,逻辑严密,无懈可击。然而,实践并未如构词那么滴水不漏。“苦干三年,幸福千秋”已然离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更是走火入魔。

“瓜菜代”一语的出现,意味着高潮过后的极度困难,而“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的领袖指示具体入微,又让人感到一份温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三个排比句为民立极,有“人心齐,泰山移”的力量感。

“造反有理”的呐喊打破了来之不易的平稳。“砸烂某某狗头”,“把某某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口头禅,其暴力思维火药味和想象力,共同构成了一种

罕见的语言极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也不能不吃饭。在当政者筹划“斗批改”之时,芸芸众生还是要结婚生子踏实过日子,他们的追求叫做“三十六条腿”和“三转一响”,而对文化生活贫乏的不满则表述为“八亿人民八个戏”和“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十月的惊雷,春天的故事,新中国的历史打开一个新的篇章。改革开放,词语也迎来一个丰收的季节。

当初对“入世”的担忧,表述为“狼来了”,后来毅然入世,又被称做“与狼共舞”。然而毕竟,WTO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入世”元年也就成了“私家车”元年;“大哥大”的高贵神秘,被民工人手一机彻底打破。从不能“保护落后”的振聋发聩中,人们日渐明白了合作和共赢的道理。

《子夜》拍成电影,或许是股市的预备课,至少让人知道了“空头”、“多头”。及待股市真正开场,便成了词语创造的活跃地带。V形反转、岛形反转、过山车行情……一个走势一个名称,实可以层出,名可以不穷。今年的“带鱼行情”,形象而准确地描述了一个使只想吃肉段把头尾留给别人的老谋深算者不断失算的走势,令人拍案叫绝。

将白领、精英、骨干合并简称为“白骨精”,极尽幽默调侃之能事,同时也表明一个社会中坚阶层已经脱颖而出。“洋插队”的说法出自如今留洋一辈还是他们上山下乡的父



辈,大概难以考证,但其中不能不有当年插队落户的联想,自不能不有今昔沧桑的感慨。“海待”接踵“海归”而来,随口化为“海带”、“海龟”,彰显了我们语言创新修辞追求一贯的永远的意犹未尽。奥运场馆以“鸟巢”和“水立方”这样的非正式名称闻名,呼动车组为“子弹头”,也同样充分证明了这点。

网络将世界变小,“地球村”脱口而出。东边两个邻居的文化影响被叫做“日流”、“韩流”,对其文化的欣赏追崇被叫做“哈日”、“哈韩”。这一“热”一“寒”,巧妙而有趣。“便当”、“量贩”、“料理”、“物语”等日词广为流行,“韩乐”、“韩剧”演化出对“韩版”美女美男的推崇

和对“韩版”服饰妆容的追捧。人们的心态从容平和了,懂得美可以有多种形式,欣赏可以有多种选择,而不同观念也可以并存或兼容。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世博”在倒计时中日渐临近。志愿者喊出了“世界在你眼前,我们在你身边”的口号,在“世博会”的舞台上,将对“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做出生动的诠释。

在新中国六十华诞风和日丽之际,蓦然回首,这一路有崎岖有曲折,但我们始终在前行。日常词语的巨变,草蛇灰线,正是社会变化的折射,证明着我们的努力与进步。

·知识窗·

## 尼姑的由来



尼姑是汉族人对信佛女子的俗称。确切的称谓应是“比丘尼”,这是梵语的译音。佛教第一个出家女子是摩诃波·波提,她是释迦牟尼的姨母。释迦牟尼出生后7天,生母摩耶夫人逝世,他由姨母抚养成人。释迦牟尼成道后,摩诃波·波提随他出家。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由于佛教经典传译不广,一般人只知剃除须发即为出家,不晓得受戒仪式。直到东晋末年,我国尚无符合戒法的比丘尼。南北朝宋元嘉六年(公元429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有8

位比丘尼乘海船到宋都城建业(今南京)。她们是最早来到中国的比丘尼。元嘉十年,又有狮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11人来到中国。她们在南林寺修筑戒坛,为中国女佛教徒慧果、净音等300余人重新受戒。从此以后,我国才出现了真正的比丘尼。

## 刘南垣接待御史

刘南垣，明朝嘉靖年间做过工部尚书，告老后回到老家南京乡下居住。有一天，当地县官上门来向他借菜单。刘问做啥，县官说朝廷派来的监察御史明天要来检查工作，听说这位御史美食家，吃食十分挑剔，很多郡县因招待不周都挨批了。我们思量，领导您的用膳一定精致，所以想借用一下您的菜单作参考。刘南垣听后笑了：“这位御史是我的学生，我来接待他吧。”

等到御史来了，刘南垣果然把他请到家中：“老夫本想在酒店设宴款待你，恐怕耽误你的公务，所以只请你到家中来叙谈。碰巧老

妻出门，没人张罗，不知家常便饭你能赏光吗？”老师这么说了，御史自然不敢推辞。从早晨一直坐到中午，饭还没有端上来，御史肚子饿得咕咕叫。好不容易开饭了，一看，只是高粱米饭和一盆豆腐而已。主客各吃了3碗，御史觉得很饱了。过了一会儿，佳肴美酒陆续上来，放满了一桌，但御史是一筷也吃不下了。刘一定要他再吃一点，他说：“已经很饱了，一点也吃不下了。”刘南垣这才笑着说：“可见饮食原无精粗，饥时易为食，饱时难为味，就看是啥时候吃了。”御史接受了教训，再不敢为了餐饮而谴责下属了。

## 妙联趣谈

“经冬历夏观春秋，也观春，也观秋，也观句，也观逗，句不明白逗糊涂。

坐南朝北卖东西，也卖东，也卖西，也卖姜，也卖蒜，蒜不够本姜够本。”

这是唐朝大诗人李白和杜甫的妙对。乍一看，李白的上联并不难对，他只不过把春夏秋冬和读《春秋》连在了一起，并用几个同音字表明了自己读书的体会而已，可细想想又确实难对。杜

甫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巧妙地对上。

“佛手供佛，佛伸佛手拿佛手；神头奉神，神抬神头看神头。”博山神头大庙香火繁盛。一日，诗人赵执信前去游玩，见供桌上摆着水果——佛手，遂出此上联，后被来此游玩的蒲松龄对上。二人皆用了拟人的手法，又伸手又抬头，把神写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 『幸运』的唐宋囚犯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掌握子民的生杀予夺大权,常以施恩为名赦免犯人。如在皇帝登基、驾崩、更换年号、生儿子、立后、立太子、打了大胜仗等情况下,常颁布赦令。天下大乱或者自然灾害,也会大赦,因为自然灾害的时候,民不聊生,犯罪现象就会增多,所以皇帝就大赦天下。也有一些情况正好倒过来,大丰收,经济形势很好,皇帝一高兴,也宣布大赦,来缓解阶级矛盾和

社会矛盾。

大赦这个风气是从汉朝开始的,唐宋时期天下大赦的频率相当之高,大概平均 18 个月,也就是一年半,皇帝就要来一次大赦天下。所以,唐朝的徒刑,规定最高只有三年,因为平均一年半左右就会有一次大赦,判罪犯坐三年牢,实际上没有意义,唐宋囚犯坐牢很少有能坐满两年的。

因此《水浒传》里的那些梁山好汉,有了人命案以后,往往是选择出去避风头,然后老老实实地等天下大赦,实在不行,他们也会选择去吃官司,反正也坐不了几年牢。宋江杀了阎婆惜以后,要被刺配江州,父亲宋太公对他说,你现在到江洲去,不要去做强盗,一年半载等到皇恩大赦下来,依旧回来父子团聚。

到了元代,大赦的频率就有所下降,大概就是平均二三年一次,还是比较频繁的。到了明朝就大幅度下降,大约是平均五年多一次。到了清朝,平均 14 年多才会大赦一次。而且清朝一般采取的大赦是打了折扣的,不是把罪犯的罪行全部赦免,而是给予普遍的减刑。

18 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里曾谈到中国古代的皇帝大赦,对之批判了一通。他说,中国皇帝不讲道理的,没有逻辑性。因为皇帝也是最高法官,你判了他刑,你怎么又去赦免他,他觉得这个不正常,因为在欧洲判刑是法官判的,然后国王作为最后的公正主持者,来赦免罪犯。

· 知识窗 ·

### “三思而行”本是贬义

“三思而行”,一般辞书释为:经过反复考虑,然后才去做。该词意含褒义。

事实上,“三思而行”最初含贬义。《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是春秋时鲁国的大夫,据说他在

执政期间处事十分谨慎,每事必三思而后行,却屡屡出错。所以,孔子听到后批评季文子做事谨小慎微、犹疑不决、优柔寡断。他真正赞扬的方式是:“再,斯可矣。”也就是说,凡事经正反两方面考虑之后,权衡其利弊即可作出决定,无须乎三思。

清代皇帝的服装并不只是一件衣服那么简单，自黄帝及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开始，冠服就超越了蔽体御寒的实用功能，

而具有了“严内外，明等级，辨尊卑”的社会属性。

### 皇帝的四季服装

清代皇帝的服装基本上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雨服和便服几大类。其中礼服包括朝袍、端罩(一种外褂)和袞服(既可与朝袍套穿，也可与龙袍和常服袍一起穿的衣服);吉服包括袞服、龙袍;常服则是介于礼服和便服之间的一种服装;外出或打猎穿行服，雨雪天穿雨服。可见，人们平时常说的“龙袍”，其实只是作为皇帝吉服中的一个门类而已，主要用于重大吉庆节日以及先农坛皇帝亲耕等场合。而观众在影视剧中看到的皇袍，更多的是属于常服或便服这一种类。

在清代皇帝的几大类服装中，朝袍是皇帝在登基、大婚、万寿圣节、元旦、冬至等重大典礼和祭天、祭地等祭祀活动时所穿的礼服，根据不同的季节，又有四季适用

的皮、棉、夹、单、纱多种质地，颜色也并不是只有人们普遍认为的明黄色一种，而是有明黄、红、蓝和月白(浅蓝)4种颜色。

按清朝《大清会典》规定，皇帝的朝服一般“色用明黄”，还用于御殿朝贺及地坛祭地、先农坛亲耕和祭太庙等场合。至于其他颜色朝服的穿用，则在祭天和天坛祈谷时用蓝色，日坛朝日用红色，月坛夕月时用月白色。

### “龙袍”上不仅龙唱主角

作为皇帝吉服之一的龙袍，上面除了龙唱“主角”之外，还布满着形形色色的配角，甚至连平时人们不大喜欢的蝙蝠也在其中。龙袍上每个图案其实都有着丰富的含义。以清乾隆明黄缎绣五彩云蝠金龙十二章吉服袍为例，该龙袍通身绣九条金龙。正龙绣得正襟危坐，一团威严，行龙绣得极富活力，似动而非动。4条正龙绣在龙袍最显要的位置——前胸、后背和两肩，4条行龙在前后衣襟下摆部位，这样前后望去都是五条龙，这寓意九五至尊。

此外，龙袍在龙纹之间



还绣以五彩云纹、蝙蝠纹、十二章纹等吉祥图案。五彩云纹是龙袍上不可缺少的装饰图案，既表现祥瑞之兆，又起衬托作用。红色蝙蝠纹即红蝠，其发音与“洪福”相同，也是龙袍上常用的装饰图案。在龙袍下摆排列着代表深海的曲线，这里被称为水脚，水脚上装饰有波涛翻卷的海浪、挺立的岩石，这种纹样被称为“海水江崖”，寓意福山寿海。

### 制作一件朝袍耗时两年

清代皇帝的衣料由内务府广储司拟定式样颜色及应用数目奏准，对缎匹长阔尺寸、质地、花样、色泽都有明

确的规定。据悉,三织造织成匹料后再送交裁作、绣作、衣作,刺绣由如意馆画工设计彩色小样,经审后,按成品尺寸放大着色发交内务府和江南织造衙门所属的绣作进行生产。完成后陆路进京,如后宫所用则经水运进京。期间用绣工近50人,绣金工40余人,画样过粉10余人,合计近千人。如由一人刺绣则要用两年零五个月才能完工,在此期间内,穿衣人的体态甚至已发生了变化,于是聪明的工匠在织造阶段就在面料边缘留下了足够的改动空间。

据记载,皇帝一天之中多次更换服饰,有时一天内更换二至三次,清宫内设有尚衣监,存放皇帝的袍褂和服饰,又有专门的衣服库,管理皇帝平日常用的服和冠,还有一大群随时侍候皇帝更换衣服的太监们。

## 贪官为清官跑官

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升为浙江淳安县令后大搞反腐,断了其他官员的财路,浙江的官员都恨死了海瑞,可是又找不到海瑞的错。左思右想,终于有了新思路:我们罢不了你的官,我们还升不了你的官么?于是大家都给海瑞唱赞歌,都说海瑞能力超群,清廉无比,政绩突出,这样的人不重用,那可真是帝国损失。如此运作一番之后,海瑞的政声上达朝廷,朝廷觉得人才难得,于是先把海瑞调出浙江,“另有重用”。

朝廷随后又把海瑞调到了江西兴县。海瑞到任没几天,就向豪强举刀,针对地主隐瞒土地的现象,开始重新丈量土地,核实赋税,大力打击“偷税漏税”。当地豪强觉得以浙江的办法来对付海瑞最好,于是豪强出钱,官员出力,为海瑞去跑官。这一招还真有效,海瑞到兴县任职不到两年,就因“工作出色,政绩突出”,升任为户部主事,每天看看书,签签公文。反腐败,那已经不是海瑞的事了。

晚清据说有“三屠”,张之洞谓屠财,曾国藩谓屠人,岑春煊谓屠官。“晚清海瑞”就是这

个被呼为“屠官”的岑春煊。

岑春煊任两广总督后,大搞“廉政风暴”,他耗子也抓,老虎也打,铁心反腐。他先后打了两只“小老虎”,一是南海知县裴景福,一是海关书办周荣耀。这两人与当朝“宰相级人物”奕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头上动土就等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但岑春煊硬是将这两人搞垮了。

兔死狐悲,其他官员恨得要死。但是岑春煊正受慈禧恩宠,说坏话没用,说好话,有用。他们于是凑钱悬赏云:“有能使岑屠离开两广者,赏港币百万。”重赏之下,大家都活动开了,都往京城去“上天言好事”,说岑领导这好那好,万般都好,这样的官不升真没天理。

恰在这时,云贵出现了匪患,大家觉得这是个极好的进言机会,于是都说岑领导是将军出身,剿灭云贵匪患非得以干练知兵的岑春煊者不能胜任,军机大臣奕劻“内举不避仇”,向慈禧推荐岑春煊去建功立业,慈禧就把岑春煊调离两广了。两广官员于是大大舒了一口气,又过起从前的日子。



冬至,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与节气相关联的节日。

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使用“圭”(又称土圭、圭表,是中国古代用于测量日影长度和位置的仪器)测定出一年中日照

时间最长和最短的两个节气点,即冬至和夏至,合称“二至”。其中,冬至是一年中昼最短,夜最长的一天。自冬至开始,昼逐渐加长,夜逐渐缩短。

在宋人李防等辑录的《太平御览》一书中,有对“冬至”这个名称的解释:“冬至有三义:一者阳极之至,二者阴气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曰冬至。”由于冬至在一年中,是昼夜长度变化的转折点之一,而古人又以昼为阳,夜为阴,所以人们还认为:“日冬至,则一阴下藏,一阳上舒。”(司马迁《史记·律书》)即从冬至这天起,阴气逐渐下降,阳气开始上升,大地万物由此“还阳”。因此古人在纪年时便将

冬至所在的农历(亦称阴历)十一月,定为太阳历(中国的农历属阴阳合历。以太阳的运行位置确定年的长度,而以月相盈亏确定月的长度)一年的起点。在用十二地支纪月时,第一个地支“子”便代表十一月,称为“建子之月”。

因为冬至是一年中太阳距离地球北半球最远的一天,这天、正午时分的太阳影子最长,所以古代的天文学家更将这一天作为观测太阳位置,确定上一

年的长度是否与太阳围绕地球旋转一周的时间相吻合(古人认为太阳是围绕地球旋转的,

即“地心说”)。并以此作为制定第二年历法,即新“皇历”的依据。

## 冬至话“数九”

古人受“阴阳”学说的影响,将世间的万物都划分为阴、阳两个属性,数字亦如此。古人视单数(奇数)为阳数,双数(偶数)为阴数。而自冬至开始,昼逐渐加长,预示着阳气渐盛。所以至迟在宋代,人们便将最大的阳数“九”,即所谓“极阳之数”与“阳气之至”的冬至联系在一起,从冬至这天起开始“数九”。以9天为一个周期,循环排列至第9个9天为止,共81天。待“数九”结束,已是春暖花开时节。“九尽桃花开”,“九九八十一而寒尽”。所以“数九”的文化习俗,体现了人们顺应自然,企盼大地早日回暖,万物尽早复苏的心理。

古人根据“数九”期间的气候、物象等自

然现象的变化,还创作出《九九歌》。不同朝代和地区的《九九歌》也不相同。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箎篴(古代由西域传入的一种簧管乐器,今称管子);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六九五十四,穷儿争意气;七九六十三,布纳担头担;八九七十二,猫狗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起出。”(明谢肇淛《五杂俎》)清代山东潍县王之翰亦作《九九歌》:“一九冬至一阳生,万物自始渐勾萌,莫道隆冬无好景,山川草木玉装成;二九七日是小寒,田间休息掩柴关,千家共享婴宁福,预计来年春不闲;三九严冬水结冰,罢钓归来蓑笠翁,虽无鲤鱼换新滑,且喜床头樽不空;四九雪铺遍地平,朔风冽冽起新晴,朱绋公子休嫌冷,总有樵夫赤足行;五九元旦一岁周,茗香醪酒答神麻,太平天子朝元日,万国衣冠拜冕旒;六九上元佳景多,满城灯火映星河,寻常巷陌皆车马,到处笙歌表太和;七九至数六十三,堤旁杨柳如含烟,红梅几点传春讯,不待东风二月天;八九风和日迟迟,名花先发向阳枝,即今河畔冰开日,又是渔翁垂钓时;九九鸟啼上苑东,青青草色含烟萌,老农教子耕宜早,二月中天起卧龙。”这首《九九歌》十分生动、形象地勾勒出“数九”时节的气候、物象和民俗,读来清新上口。各地流传的《九九歌》尽管内容各异,但多描述了当地冬至以后自然景象的变化,且大多意明简要,极易上口,所以常作为农家适时耕作的参考和

依据,故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不过,虽说冬至是阳气上升之始,但由于日照不足,天气十分寒冷,人们很少到室外活动。特别是三九、四九,更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人们难以外出。于是从明代开始,人们便于“数九”期间,在室内进行一些消遣娱乐活动,其中即有《九九消寒图》。其活动内容是涂染字、画。“日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帝京景物略》卷二)即画一枝素梅,其上绘有81朵梅花。从冬至这天开始,每天用红笔涂抹一朵梅花,待梅花全部涂红,“数九”结束。还有的绘制九宫格或9组圆圈,每组9个,共81个格或圈。每天涂染一个格或圈。涂染时,必须一天一染,不能漏染或提前。涂染时还有讲究:“上涂阴天下涂晴,左风右雨雪当中。”即逢阴天时,只涂格、圈的上部;晴天只涂下部;遇风涂左边,遇雨涂右边;若是下雪,则涂中间。等到“数九”结束时,这张《九九消寒图》上面的81个格或圈不仅全被涂抹、染色,而且还成为一张天气记录图。



## ●文史拾趣●

此外还有描字,即描红的活动。先选笔画均为9画的9个字,共81笔画,组成一句诗。如“春前庭柏风(风)送香盈室”,都写成空影字。每天描一笔,每过一个“九”,正好描完一个字。等到“数九”结束,9个字也全部描完,故又称为“九九消寒句”。还有一种“九九迎春联”,上下联都是9个字,每个字也都是9画。如“故城秋荒屏栏树枯荣,庭院春幽挟巷草重茵”。每天在上下联各描一笔,待春暖花开时节,一幅完整的春联便呈现在纸上。

这种数九消遣活动在明清两代的皇宫内也同样流行。明朝后期,每年冬至前,司礼监(宫中的太监机构)都要印制一批《九九消寒图》或诗句,分送至宫中各殿堂,贴于墙壁上,以供帝后和嫔妃们消遣娱乐。清朝道光皇帝曾御制一幅《九九消寒图》,上书“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风)”9个空影大字。每天由进宫值宿的翰林或官员逐日用朱笔描一笔画,还要在大字左下方,用小字标注当天的日期和阴晴风雪等天气情况。

这种年年相袭的“数九”消遣娱乐活动,在清朝皇宫内一直延续到末代皇帝。溥仪在位时,爆发辛亥革命。之后,他虽然仍生活在紫禁城内,但终日无所事事。是年又逢冬至,侍奉溥仪的随从们想方设法给他消愁解闷,而为他制作了一张《九九消寒图》。不过,这也因此成为清朝皇宫内的最后一张消寒图。

- 48 -



## 名人与麻将

### 梁启超:因“四人功课”推掉演讲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种“趣味”的游戏。据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

### 梅贻琦:“看竹”胜率不足三分之一

梅贻琦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寡言、慎言的他,有着严肃而沉默的形象,让人很难将他与打牌联想在一起。由清华出版社出版的《梅贻琦文集》二册,内容为梅贻琦在1956至1960年间所写的私人日记。出版社工作人员特别针对梅贻琦的生活面,作了趣味的统计,而爱打麻将就是其中之一。

梅贻琦日记中不写打麻将,多改用“手谈”或



“看竹”加以取代。据日记所载统计，仅在1956~1957年，就打了85次之多，在85次方城之战中，梅校长共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前后输了1650元。当年一碗阳春面不过才1元钱而已。

### 胡适：怪“麻将里头有鬼”

胡适虽然喜欢打麻将，但水平并不高。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饭后开房间打牌，言明只打八圈。到最后一圈局势十分紧张。当时，胡适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牌落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牌。胡适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胡适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犹豫好一阵子，啪的一声，胡适还是把白板打了出去。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适身上现钱不够，还开了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这在那时可不算小数目。

相对于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捷，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

### 闻一多：临阵磨刀舍命上阵陪老外

闻一多年轻时不会玩麻将。留美期间，一次到科罗拉多大学两位教授家做客，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提出玩几圈助兴。闻一多连忙解释对麻将一窍不通，甚为窘迫。两位美国教授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还不会打麻

将，以为他有意推托。闻一多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参阅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一局，甚是窝囊。此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的局面。

### 梁实秋：自嘲脑子迟钝影响麻局节奏

梁实秋小时候有次向父亲问起麻将的玩法，梁父正色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也对麻将留下了坏印象。

有几次梁实秋硬被拉上桌，他玩了玩，还是觉得吃力，觉得打牌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作壁上观。他解释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我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一快就出差池。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往往反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干脆不如不打。”





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包拯曾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朝野为之震动。

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敬仰。宋嘉祐六年(1061年)，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

传统戏中，包公经常被

宋朝处于宰相制度的调整期，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编制也不固定。很明显，“多相并行”的目的在于分散相权。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后来参知政事

与正宰相基本无差别，使正宰相事权更为分散。在宋朝，

在文武百官心目里，宰相之职近于鸡肋，食之无味且有些危险，弃之却心有不甘。包拯是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宋景祐四年(1037年)，任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后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

显然，包拯担任过的最高行政职务是枢密副使，也

就是枢密院的副长官。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因此，虽然包拯没有担任过宰相职务，但其担任的枢密副使也可称为副宰相级别的官职，被后人称为“包相爷”也不算太错。

## 包拯未做过宰相

## “慈母” 曾是伤心事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是唐诗中最为温馨的一首诗。其实，在早先，慈母之“慈”与“慈祥”无关。

“慈母”最早现身于《仪礼》：“慈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妻子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由此可知，要想成为慈母，下列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具有小妾身份；必须没有或者不会生育（至少是没有生育男孩）；更关键的是，丈夫必须还有另外的妾，且这个妾恰好一命呜呼并正好遗留下一个男孩。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还需要丈夫下达明确的指令：“你把这个死了母亲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起来吧！”知道了这



些，在读到《仪礼·丧服》中“慈母如母”时，才不会感到过于突兀。所以，从词源的角度来说，“慈母”是一段伤心往事。

《仪礼》所严格定义的“慈母”，词义内涵慢慢发生了演变，至少在唐代，“慈母”已经不再是一个专称。李白的诗中就有“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的句子，显然这里的“慈母”就不是《仪礼》中的“慈母”。

## 金龟婿的由来

唐朝诗人李商隐著名的《为有》诗写道：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

唐朝初年，内外官员五品以上佩“鱼符”、“鱼袋”，来区分身份贵贱和职务高低。武则天上台后规定，原来的“鱼符”改为“龟符”。三品以上佩戴“黄金龟”，四品佩戴“白银龟”，五品佩戴“青铜龟”。可见，

金龟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后世遂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但在现代汉语中，其“贵”的含义正在逐渐减弱，而“富”的含义却有逐日加强之势。

与“乘龙快婿”、“东床婿”指“女儿的配偶”不同，金龟婿侧重于指“女子的配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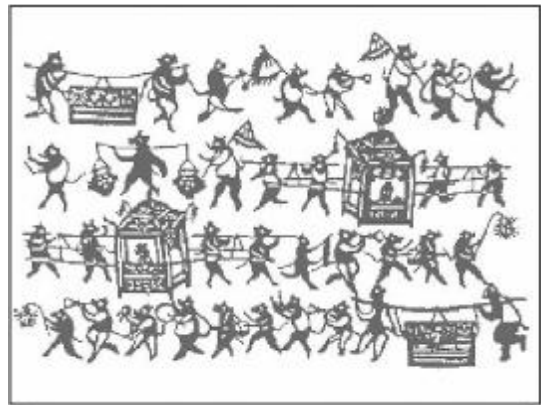
## 鼠婚习俗

“顺”即同向。所谓“顺喜”，即基于相似律而导致人和鼠的同向效果，表示喜庆热闹、丁口繁盛。现代的老鼠嫁女剪纸和刺绣，多不出现猫，只是渲染老鼠嫁女的热闹与红火，一派升平景象。还有人以老鼠繁殖能力强，视鼠婚为求子手段。过去陕西、山西、天津等地都有做老鼠馍的习俗，希望当年过门的新媳妇吃了鼠馍的尾巴，便能早生多生。所谓“顺财”，

为什么老鼠嫁女的年画或剪纸里，有的会有一只虎视眈眈的猫，有的却是吹吹打打一派祥和？

早期的鼠婚俗信（“俗信”即渐渐约定俗成的传统理念）以和胜、厌胜为多见，而现当代鼠婚俗信则以顺喜、顺财为多见。

“胜”即克制。所谓“和胜”，即借助对鼠的尊崇、媚事，以求人鼠和平共处。有些地方甚至认为老鼠是仓神，人和鼠共享粮仓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厌胜”即通过诅咒，达到克灭老鼠的效果。许多早期的鼠婚年画中，会有一只虎视眈眈的猫，还有题词：“一伙小老鼠，作怪成了精。猫王生了气，连皮一口吞。”



即希望借助老鼠敛财的同向效果，使人发家致富。老鼠窃财、敛财手段高明，被人视为小财神。广东、湖南等地在贴鼠画、摆鼠像时，要鼠头朝外、鼠尾朝里，意味着吃在外面、厕在里面，为主人聚敛更多的财富。天津一带也有相似的习俗，上元节期间，除向神佛供奉花糕、馒头外，还有背上驮着元宝的老鼠馍和刺猬馍。上供时，鼠猬头朝外，拜完之后，要把鼠猬转向头朝里，表示它们已经把神佛赐予的财宝驮回家了。



# 清代的滑冰

滑冰,古代叫“冰嬉”,或称“冰戏”,在我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远在公元十世纪的宋代就有了记载,如《宋史·礼记》就记载了当时宫廷中的这种游戏:“幸后苑观花,作冰戏。”清代初年,冰戏便在北京兴盛起来,而且由以前的军中习武,渐渐发展为供皇帝校阅观赏之用的典制。

乾隆年间,在太液池旁,自东至西建起了“庆霄楼”,专供皇帝观赏冰戏。清初的几个皇帝无不登上此楼校



阅观赏。《清朝文献通考》载,“冰戏每岁十月”,在八旗士卒中“照定数各挑选善走冰者二百名”,于西苑三海验冰习武。所谓“验

冰”,就是在冰戏前夜凿冰验质,击声如石,方可上冰。至于冰鞋,古称“冰凝”,是用一根钢条嵌于鞋底之下制成的。这在当时的诗文中也有反映,如《燕京岁时记》云:“冰鞋以铁为之。”《都门纪略》中有一首竹枝词说:“往来冰上走如风,鞋底钢条制造工。”《从偶斋诗草》也有“炼铁贯韦当行滕”、“铁若剑背冰若镜,以履踏剑磨镜行”等诗句,可见当时的冰鞋,很接近现代的冰鞋。

和现在不同的是,冰戏场上,设有一特制冰床,供皇帝观赏之用。冰戏结束后,还有隆重的赏赐仪式。“头等三名,各赏银十两;二等三名,各赏银八两;三等三名,各赏银六两,其余兵丁各赏银四两。”(《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五)

三冬:古人以农历十月为孟冬,十一月为仲冬,十二月为季冬,将三个月合称“三冬”,代指冬季。唐代诗人杜甫《遣兴五首之二》诗中云:“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

九冬:冬季三个月共九十天,因此冬季又称“九冬”。如南朝沈约《夕行闻夜鹤》诗中云:“九冬负霜雪,六翻飞不任。”

清冬:冬季万物萧条,天地间一片清寒,故冬季又有“清冬”之别称。如唐代诗人皇甫冉《冬夜集赋得寒漏》一诗中云:“清冬洛阳客,寒漏建章台。”

玄冬:“玄”为黑色。古代以四方为四季之位,北方为冬位,其色黑,故冬季别称“玄冬”。

如东晋张望《贫士诗》诗中云:“炎夏无完衣,玄冬无暖褐。”

## 冬季别称

穷阴:古代以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冬季又是一年最后一个季节,故称“穷阴”。如白居易在《岁晚旅望》诗中

云:“向晚苍苍南北望,穷阴旅思两无边。”

北陆:北陆本指太阳冬季所在的方位,后来被人们用来代称冬天。如西晋张载《七哀诗二首》其二云中云:“朱光驰北陆,浮景忽西沉。”

此外,冬天的别称还有“岁余”,如唐孟云卿《田园观雨兼晴后作》诗中云:“秋成不廉俭,岁余多馁饥。”

## ●知识窗●

春节民俗纷繁多样，但所有地方的民俗中，都包含“放生”的内容。在古人看来，春节并非只是人类的节日，它是人与自然共同的节日。

关于放生最早的记载，始于赵简子，他是春秋时赵国人，喜欢大年初一放生，他认为：“正旦放生，示有恩也。”

于是，邯郸人纷纷捕捉一种叫“鸩”的鸟，以满足其放生欲，赵为此厚赏献“鸩”人，直到他的门客发现，这等于是变相鼓励捉“鸩”，为好生而杀生，赵简子可谓愚人。

后代春节放生多选在初八，因为这一天是传说中谷子的生日，对于农耕社会来说，谷是命脉，这一天人们要观谷、食谷和养谷。城里人需带着孩子到农

村看如何种谷，如何从事农业生产。鸟是吃谷的，会抢夺人的收成，所以这一天要放生(主要是鸟和鱼)，表达好生之德，同时也贿赂一下鸟类，让它们嘴下留情。

选择这天放生，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初八是顺星之日，可以让星宿看到自己的善行。依照道教的说法，每人每年都有一位值年星宿，决定着一年命运，初八是“诸星下界”之日，此日要祭祀星君，求得保佑。如今人们都是正月十五吃元宵，其实是正月初八吃，以示圆满。



## 为何在初八 “放生”





# 老夫采玉歌

□ 李贺

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  
老夫饥寒龙为愁，蓝溪水气无清白。  
夜雨冈头食蓂子，杜鹃口血老夫泪。  
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  
斜山柏风雨如啸，泉脚挂绳青袅袅。  
村寒白屋念娇婴，古台石磴悬肠草。

这首诗是写采玉民工的艰苦劳动和痛苦心情。唐代长安附近的蓝田县以产玉著名，县西三十里有蓝田山，又名玉山，它的溪水中出产一种名贵的碧玉，叫蓝田碧。但由于山势险峻，开采这种玉石十分困难，民工常常遇到生命危险。《老夫采玉歌》便是以这里为背景。

头两句是说民工不断地采玉，不过是雕琢成贵妇的首饰，徒然为她们增添一点美色而已。“徒”字表明了诗人对于这件事的态度，既叹惜人力的徒劳，又批评统治阶级的骄奢，一语双关，很有份量。

从第三句开始专写一个采玉的老汉。他

忍受着饥寒之苦，下溪水采玉，日复一日，就连蓝溪里的龙也被骚扰得不堪其苦，蓝溪的水气也浑浊不清了。“龙为愁”和“水气无清白”都是衬托“老夫饥寒”的，龙犹如此，水犹如此，人何以堪！

下面两句就“饥寒”二字作进一步的描写：夜雨之中留宿山头，其寒冷可想而知；以蓂子充饥，其饥饿可想而知。“夜雨冈头食蓂子”这一句把老夫的悲惨境遇像图画似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杜鹃啼血老夫泪”，是用杜鹃啼血来衬托和比喻老夫泪，充分表现了老夫内心的凄苦。

## ●历代诗人咏长安●

七、八句写采玉的民夫经常死在溪水里，好像溪水厌恶生人，必定要致之死地。而那些惨死的民夫，千年后也消不掉对溪水的怨恨。“恨溪水”三字意味深长，正如王琦所说：“夫不恨官吏，而恨溪水，微词也。”（《汇解》）这种写法很委婉，对官府的恨含蓄在字里行间。

接下来作者描绘了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山崖间，柏林里，风雨如啸；泉水从山崖上流下来形成一条条小瀑布，采玉人身系长绳，从断崖绝壁上悬身入水，只见那绳子在狂风暴雨中摇曳着、摆动着。就在这生命攸关的一刹那，采玉老汉看到古台石级上的悬肠草，这草又叫思子蔓，不禁使他想起寒村茅屋中娇弱的儿女，自己一旦丧命，他们将怎样为生呢！

早于李贺的另一位唐代诗人韦应物写过

一首《采玉行》，也是取材于蓝溪采玉的民工生活，诗是这样的：“官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对比之下，李贺此篇立意更深，用笔也更锋利，特别是对老夫的心理有很细致的刻画。

《老夫采玉歌》是李贺少数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之一。它既以现实生活为素材，又富有浪漫主义的奇想。从结构上说，诗一开头就揭露统治阶级强征民工采玉，是为了“琢作步摇徒好色”，语含讥刺。接着写老夫采玉的艰辛，最后写暴风雨中生命危殆的瞬间，他思念儿女的愁苦心情，把诗情推向高潮。这种写法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给读者以深刻难忘的印象，颇见李贺不同凡响的艺术匠心。

·知识窗·

### 古代对朋友特有的称谓

**布衣之交** 布衣：因古代的平民百姓都穿布制衣裤，所以布衣就泛指平民百姓。“布衣之交”即指平民百姓之间的好朋友。

**刎颈之交** 刎颈：用刀剑割脖子，寓意“死亡”。“刎颈之交”即指同生死、共患难，至死也不会变心的好朋友。

**莫逆之交** 莫逆：是指在思想感情上没有任何违逆不合的地方，形容(双方)非常融洽。“莫逆之交”即指彼此之间心意相同、感情融洽和非常要好的朋友。

**忘年之交** 忘年：不计较年龄或辈分上的差异和悬殊。“忘年之交”即指虽然彼此年龄或者辈分相差很大、但双方之间感

情却很深厚的好朋友。

**总角之交** 总角：古代的未成年人将头发扎成向上分开的两个发髻，其形好似角状。所以，“总角”借指儿童或者少年。“总角之交”即指自幼就认识、并有交情的好朋友(大多数是同性朋友)。

**竹马之交** 竹马：小朋友在游戏时，将一根竹竿放在胯下当马骑，此竹竿被称为“竹马”，它与“青梅”在一起合用被借指为儿童或者少年，但在感情上要胜过“总角”，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指异性之交。“竹马之交”即指自幼在一起玩耍、两小无猜和有交情的好朋友(大多数是异性朋友)。